

《燕京大学1919-1952》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燕京大学1919-1952》

13位ISBN编号：9787213055379

10位ISBN编号：7213055372

出版时间：2013-7-1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作者：陈远

页数：26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燕京大学1919-1952》

内容概要

这不仅是一部校史，更是中西文明冲突视角之下的中国近现代史

燕京大学校友余英时作序、章诒和题写书名

94年来最独特、最好看的燕京大学校史

燕大一隅，折射着整个近现代中国的命运

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燕京大学校长，燕大开始它33年短暂历史中的辉煌业绩；1952年在新政权推行的“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永远地消逝了。33年间，燕京大学在教育方法、课程设置、规章制度、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极为显赫的声名，并一度与北大、清华比肩，被誉为“中国教会大学之首”“世界一流大学”。更为重要的是，五四运动、西安事变、国共内战、学生运动……近现代中国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和燕大有关；司徒雷登、傅泾波、张东荪等燕大人，也深深地介入了时代。本书讲述了民国一代学人风采、教会学校在中国的曲折历程、燕大著名校友的逸闻趣事、燕大在抗战中的特殊作用、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共和国建立后知识分子的命运等侧面，通过燕大这个角度，展现出中西文明冲突中一个时代的命运。

本书取材丰富、分析精密、叙事流畅、论断公允，不但如实地保存了燕京大学33年间的辉煌业绩，而且更将它“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内在精神生动地呈现了出来。

——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燕大校友 余英时

《燕京大学1919-1952》

作者简介

陈远，近代史学者、媒体人。学术视野关注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国大学史、文化生态变迁、知识分子研究等题目，近年来主要从事燕京大学的史料收集以及相关研究，另外侧重于重新构建民国史体系。2008年赴香港中文大学做短期访问，2011年受澳门大学之邀为其研究生院做学术演讲。著有《燕京大学1919—1952》《消逝的燕京》《负伤的知识人》《在不美的年代里》《穿越美与不美》《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新传》等。

书籍目录

代序（余英时）	1
自序	1
第一章 诞生于伟大时代	1
第二章 司徒雷登的起点	23
第三章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45
第四章 扎根中国	59
第五章 学术上的崛起（一）	83
第六章 学术上的崛起（二）	97
第七章 司徒雷登	129
第八章 战争中的燕京大学	151
第九章 革命中的燕京大学	177
第十章 天翻地覆之际	195
第十一章 燕京的消亡	209
后记	255
参考文献	257

章节摘录

四、国共两党博弈中的学生运动 抗战胜利之后，内战接踵而来，在这场关于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搏斗中，被毛泽东称为“第二条战线”的学生运动，在权力转移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杰西·格·卢茨在《中国教会大学史》一书中论证分析的那样：如果说学生是中国城市舆论的晴雨表的话，那么，1948年学生的情绪明显地表明“天命”已经从国民党转移到共产党这边来了，因为随着同国民党的疏远接踵而来的就是承认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了。1946年至1949年间的学生运动有助于在民众中造成对国民党统治普遍不满的印象，同时，左派学生则协助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渡。

在从1946年底到1948年暑假的一年半里，北平全市性的集会示威游行共达7次之多。作为在民族主义兴起过程中已经成为北平学生运动主力之一的燕京大学学生，一次不落地参加了这些学生运动。当事人张世龙在事后的回忆中，直接明了地说明了这些学生运动的性质：燕京大学的学生运动，是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燕大学生自治会于1946年成立，是胜利后北平各大学中成立最早的自治会之一。学生自治会负责人殷书训、沈立义、包儒、张少琴、袁淳曾等共产党员、党的外围组织成员站在历次斗争的前列，成为运动的骨干，学生自治会则是学生运动的组织者。

与之前在民族主义兴起过程中的学生运动不同，这一时期的学生运动更多表达的是学生们对于国民党政权的不满，以及由于美国对国民党的扶持而引发的把美国同国民党政权联系在一起的倾向。沈崇事件的爆发是其中的典型事件之一。这一事件在最初阶段北平市政府向美国当局提出正式抗议后，美国当局立即表示道歉并逮捕了被指控为强奸犯的美国士兵，温和解决看起来应该是水到渠成。但是北平的学生和民主同盟方面抓住了这一问题发动了一场学生运动。当年参加了这一运动的燕大校友张大中向笔者口述这一历史事件时，表示当时弥漫在学生当中的反美情绪已经非常强烈：到了（1946年）10月份，我接任了燕京地下党北系（原来在北平的地下党组织）的支部书记。那时候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有一次，我看到美国的坦克经过我们学校的门口，我想，日本人走了，美国人又来了，这是我们的国土啊！这段时期，我主要的活动就是组织反美反蒋了。

1946年圣诞节的前夜，北大女同学沈崇被美国兵奸污的消息传到了燕大，抗议的海报很快就贴满了图书馆大楼，要求行动起来罢课游行。在随后的抗暴游行那天，我看到同学们都发动起来了，也加入到里面去。我当时提了一个白灰桶，拿着一把扫帚，沿街写“GO HOME, U.S. ARMY!”（美国兵，滚回去）的标语。我的一个同学跑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的表现不错呀！”那次游行之后，北平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一浪高过一浪。我和同宿舍的同学们也经常在一起谈论时事，不同的是，每次运动，我都会进城去召开大学工作委员会会议，研究运动的部署。有一次同宿舍的一个同学看到我离校进城，问我干吗去了，我跟他说了：“回家看老婆了。”他不知道我这是因为组织的纪律，还埋怨我光说不练，我只能冲他笑了笑了事。

尽管张大中当时并没有“得到上级指示”，但是他明确地告诉笔者，“这场运动在南系党支部是经过决策的”。在运动的影响下，燕京的教授以请愿书的形式支持燕京学生提出的美国撤军的要求，并且同北平其他大学的教师一起写信给当时已经出任驻华大使的老校长司徒雷登，要求美国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燕京的学生们在此次运动中表现得尤其激烈，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并无亲美的倾向，他们再一次号召全国学生举行联合抗议。

发生于1947年5月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是从抢救教育危机、各大学要求公费改善待遇开始的。最先把饥饿与内战联系起来的是清华大学。张大中虽然人在燕京，但是在这次运动中却起了关键的作用。当时清华围绕着饥饿和内战的问题展开过很多讨论，讨论的内容都在壁报上登出来，讨论之后大家得出结论：“饥饿的原因在于内战。”但是在怎么提出口号的问题上，有的认为应该把“反内战”放在前面，有的认为应该把“反饥饿”放在前面。当时在清华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同学是从燕京转过去的，他跟我讲了这个情况，我跟他说了我的意见：应该把“反饥饿”放在前面，因为饥饿是人们的切身感受。5月15号，清华学生代表大会经过激烈的讨论，终于确定了正式的口号是“反饥饿反内战”。燕京大学是在5月18号谈论这个问题的，当时在大礼堂，一个有国民党军统背景的学生说：“从老百姓立场看，一个巴掌拍不响，内战是国共双方打起来的，应该要求双方下令停战。”这个说法让很多人一下觉得很合理。我和其他地下党的负责人小声商量了一下，几个人轮番发言批驳了那个人的说法。那人还想说话，引起全场同学一片嘘声。这时，大会主席提出表决，通过了罢课并和其他大学一致行动的决议。5月18日国民党出动军警在西单、北池子镇压反饥饿反内战宣传队，一下子把同学们激怒了，反蒋的情绪更高了。5月20日大游行那天，我为了了解情况，骑着自行车在清华和燕京的队伍中穿行，随时和大游行主席团的同学保持着联系。大队行进到天安门的时候，探路的纠察队员传来西单一带有特务的消息，我赶忙跑到大队最前面去看

情况。当时还有一张照片留了下来。这次运动过后，我去和刘仁汇报，刘仁跟我说：“有的同志看到你参加游行了，好啊！只要群众起来了，就什么也不怕了。” 张大中回忆中的“有国民党军统背景的学生”名为钱宇年，钱宇年之前曾在燕大医预系读书，据有关资料记载，钱当时的身份是“军统北平站学运组少校副组长”“特务分子”。“八一九”之后，钱宇年在燕园策动成立了“燕友社”，“打的是中间立场的旗号，成员八九十人中，除少数几个反动骨干以外，绝大多数是并无什么反动政治背景的同学”。尽管在“八一九”之后，与国民党站在对立面的学生自治会和一些重要社团的主要负责人离开了燕园，但是尚留在燕园中的由学生自治会的立委和执委组成的临时机构——选举委员会中，具有中共背景的学生人数依然占据多数。钱宇年策动成立“燕友社”的目的，便是和这些左倾学生争夺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那一年选举大会的情形，当年的左倾学生张世龙在事后有详尽的记载：

会议开始前，五六十名反动学生骨干抢占了前三排座位，我们准备发言的积极分子就坐在他们的后面，双方摆好了架势，一场激烈的舌战似乎无可避免地要展开了。可是反动分子却采用了最愚蠢也是他们最拿手的策略——捣乱。大会由选举委员会负责人李延宁、卢念高、朱德勋三同学集体主持。在李宣布开会之后，尚未报告议程，就见第一排的一个家伙跳到椅子扶手上，面向同学大喊大叫，李延宁等事先考虑到有些人可能捣乱，为此专门带了一个用于维持会场秩序的大摇铃，这时立即摇起铃来，要求此人遵守秩序。可是，前三排的那批人却大声鼓噪。我们准备发言的同学纷纷举手，主席马上指定举手的同学发言，而那批捣乱分子依然大吵大闹。发言的同学不管一切喧闹，依然面向同学讲话。一个中统特务见还压不倒我们，便一个箭步蹿上主席台去，扯着嗓子喊叫。这种蛮横无赖的行径，激起了广大同学义愤，顿时嘘声四起。这些捣乱分子也不示弱，一齐掀动折椅座板，敲得震天响，把一切声音淹没在敲打声中。会场乱成一团。坐在楼上和后排的同学站起来，似乎要退场了。可是如此散会却正中捣乱者冲散大会的阴谋。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参加这次会的冯除昌和另一同学临时写了一横幅在台前高高举起，上写“×××（指那上台捣乱的人）滚下来”，台下同学齐声高喊“×××滚下来”。加上这时在主持会议的同学立刻抬出一块黑板，在上面写了几个大字——“凡拥护本次选举的同学请起立”，哗啦一声，除前三排外，几乎全场起来热烈鼓掌，一下子就把对方的嚣张气焰压了下去。随后，一位“高唱队”的同学跳到台上指挥大家高唱《光明赞》和《团结就是力量》。在大多数同学空前团结的声势下，那几十个捣乱的人一个个灰溜溜地溜出了礼堂，在这以后几天，立委会顺利地召开了，在新立委会主持下进行了执委会的选举。因为没有看到当年“钱宇年们”的相关资料，只好单方面引用其对立面的回忆，但这已经足以说明，随着两党斗争的白热化，学生运动的政治化倾向也越来越明显。如此频繁的学生运动对于燕京大学乃至当时的教会大学意味着什么呢？《中国教会大学史》的作者卢茨如此写道：“在1945年至1949年间，学生变得愈来愈不受学校纪律的约束。政治活动开始代替学业，学校的一些正常要求也变得无法实行。教会大学历来较能对学生实行有效的纪律约束，但到1948年至1949年，这对许多教会学校来说已经不再成为特点了。教会大学的学生也同国立学校的学生那样强迫校长和教务长辞职。考试不得不推迟或中止，教学工作突然结束。关于开除鼓动者的决定也不得不撤销。自1926年至1927年的北伐以来，教会大学从未遇到过如此混乱的局面。即使是1937年的中日战争似乎也不像40年代的革命那样给教会大学带来不祥的预兆。”即使考虑到卢茨的西方视角，这样的结论应该也还算是公允之论。历史有时让人难以预料，而此时已经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显然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受到昔日他视若子女的燕大学生的猛烈抨击。那是在1948年5月的“反美扶日”全国性运动之后，司徒雷登向记者发表谈话，认为群众运动“被人操纵”，并且说中国学生接受了美国的救济，就“无权批评美国政府的政策”。那一年，司徒雷登像往年一样于6月下旬回到燕园过生日，没想到迎接他的却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标语。当年学生中的一员、已故旅加拿大学者林孟熹如此叙述当年的场景：

之后，多个学生团体包括本人在内的好几个代表去临湖轩和司徒见面。我们青年人满腔热血，唇枪舌剑地猛烈抨击美国对华政策，司徒仍然保持着他一贯的温文尔雅，偶尔作出一些解释，但更多的是倾听。最后傅泾波进来告知市府催赴晚宴，会面乃告结束。其后6月30日司徒在致国务院电文中曾报告说，由于听从燕大学生及华北学联的意见，他已取消原定于6月29日毕业典礼的演讲。这的确是明智之举，如果那天一位不久前指责过中国学生的美国驻华大使登上贝公楼礼堂发表演说，所引起的反响，绝不会仅仅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标语，或者少数几个学生的唇枪舌剑。正如在本节的开头所引述的那样，1948年，学生的情绪明显地表明“天命”已经从国民党转移到共产党这边来了。那一年，《燕京新闻》采访了6位大学教授，已经没有一个人对美国关于国共两党的和平调解抱有希望了。早在1947年3月曾经呼吁美国出面调停的张东荪，此时已经认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不复存在。他与陆

《燕京大学1919-1952》

志韦都认为，在共产党节节取胜之时根本不可能指望他们为了恢复和平谈判而作出让步。燕大社会学系教授雷洁琼更加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认为通过组织一个由善意的知识分子组成的第三方面就可以实现和平和民主的中国的话……这当然是想入非非。这是因为他们缺乏的正是实力。”他们还同时指出，美援对于中国不再有任何好处，相反，因为美援助长了内战而只能带来坏处。这些教授的声明在当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美国国会正在考虑援华法案用以支持南京政权，燕京教授们的意见会直接影响到司徒雷登，而司徒雷登的态度又会直接影响到美国国会。一个佐证是，林孟熹生前曾经问过傅泾波：“司徒校长在中国政局问题上，究竟最听信谁的意见？”傅泾波的回答是：“张东荪。”日后司徒雷登之所以积极图谋与还未建政的中共联系，与当时这些燕京教授们对于时局的看法不无关系。而也正是在此时，有些知识分子如卢茨所说，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在政治上要么甘居下游，要么接受左派的领导”。而“对于有些人来说，后者似乎更可取一些”。

《燕京大学1919-1952》

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取材丰富、分析精密、叙事流畅、论断公允，不但如实地保存了燕京大学33年间的辉煌业绩，而且更将它“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内在精神生动地呈现了出来。——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燕大校友 余英时

《燕京大学1919-1952》

编辑推荐

这不仅是一部校史，更是中西文明冲突视角之下的中国近现代史燕京大学校友余英时作序、章诒和题写书名94年来最独特、最好看的燕京大学校史燕大一隅，折射着整个近现代中国的命运

精彩短评

- 1、燕京消亡的一刻，知识分子脊梁被弯曲的过程，看得人最难受
- 2、几天读下来，感慨颇多！大学教育的好坏是反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好坏的标准。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燕京大学的校训似乎让其余大学的校训黯然。大学教育的真谛究竟是什么？就是做学问，有自由，并且能够服务于大众，服务于人类！真理是顺理成章的，只不过需要人们去追求并加以诠释，这些，做学问之人就能做到，只不过学识高低而已；自由，我认为是有多种内涵的，学术自由是首当其冲的，还有就是自由的学术环境，不被外部势力所影响；服务，就是用自由的思想加上真理的诠释来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类。这样国家才能发展，通过服务又能够反哺给学术，以致学术欣欣向荣，服务愈加细致入微。这可能就是一个大学应有之义。这样的前提是什么？就是不受到影响。当看到燕京大学的消逝，心头一紧，看到那时候德高望重的教授被迫害，心已凉。
- 3、买此书时恰在阅读《南渡北归》，正好两厢印证着，虽各有特色，但本书内容没《南渡北归》丰满，故有点买重了。
- 4、书写的不错，让我们看到中国大学的历史。
- 5、又一段被尘封的历史，有理由向那些投身教育事业的人士致敬，正视历史和历史人物。
- 6、“对待大学的态度反映一个国家对待文明的态度”~用功的著作，不是一流。
- 7、嘔血半世鑄燕京，一朝穢文汗純名。
惡黨邪作別心計，狡徒黠筆誤真清。
濁句三千博愚憤，謔語數行沽味情。
攜離傾營孤詣地，寒骨仍未落生平。
- 8、把燕京校史从前到后讲述一遍。手边备一本，方便以后查找资料。但这本书的写作极端不严谨，引证有时只标书名、不写页码，有时干脆什么都不注。前几章不少句子读起来翻译腔浓重，恐不出作者之手，而出自译者之手。书后还列了些英文文献，恐是摆样子。作者虽是记者出身，但既然写历史，就需遵循历史研究的基本规范。应得1-2星，但燕京大学的题目毕竟重要，所以勉强3星。P大鸠占鹊巢，所以P大人都应知道一些燕园的历史。发现陈寅恪是抗战时成都燕大聘任的教授，左目失明时，照顾他的就是燕京的学生。据当时校长梅贻宝回忆，陈对他感叹：“未料你们教会学校，倒还师道犹存”。
- 9、许多不能讲的你应该能猜到一些，再看看岱骏的《华西坝》
- 10、买的电子版，了解一下
- 11、很幸运在我还在犹豫是否出国的那个暑假，这本书的阅读，坚定了我出国的欲望，让我下定了决心，改了学校，改了就读城市，带着对真正学术自由和人文自由的向往，去到英国，游历欧洲。
- 12、这是我向往的学校啊！书写的非常好，当然也是因为历史内容比较丰富，燕大岂是北大能比的？
- 13、可悲可叹,燕京的消亡已经预示了中国教育的悲剧,所以现在一直悲剧着
- 14、史料运用比想象得要丰富，对燕大的发展沿革做了比较好的基本性梳理。两点遗憾：（1）作者采集的口述史料运用不足；（2）校园生活史方面仍然阙如，期待此类著作出炉。
- 15、重点关注一下南迁的状态
- 16、文字背后的力道，需要慢慢品味。
- 17、由于某些原因，本书未能更多地使用档案资料，因而以口述回忆为主要史料，不过已经非常不错了，最后一章写得最好。期待档案更公开后，能有更全面、深入的燕大史。
- 18、一声长叹
- 19、第一次全面了解燕京大学，非常详尽。没有学术自由，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只是缘木求鱼，然也。
- 20、热泪盈眶~大学的兴衰，国家的兴衰
- 21、这本书谈不上有多优秀，但从中可以窥见曾经培养出张爱玲和林语堂这样的双语作家的教会学校，是如何一步步被赤化乃至消亡的。往事并不如烟，值得我们守护和回忆的东西就这么点了
- 22、适合作为历史普及读物，作者毕竟尚不足以驾驭燕大这样的大题材。
- 23、难怪总看不起p大
- 24、逝去的大学带走了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
- 25、对待大学和知识分子的态度，反应了一个政府对待文明的态度。读懂燕京大学的历史，也是读懂中国近代史。

- 26、从建校到学科到名人，内容丰富，值得一读。在资料未公开的情况下，燕大多多少少是个迷，此书主要不是靠档案，而是靠口述。
- 27、体例上有些问题，一些地方交代的不清楚，如何更好地处理校史与民国史、建国史……即使如作者言“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校史”，和治史的方法与思路还是差别较大。
- 28、十年磨一剑的作品，资料详实，但是有些用历史迎合观点的嫌疑。
- 29、写中国教育，中国知识分子的书，每每到1949之后，都心生悲凉。多少文明与美好，死于野蛮与主义。
- 30、任何一个时代，我们都应该尊重爱护大师、学者，他们同样也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 31、有助于了解中国大学中一段被湮没的历史。反馈一个问题：Kindle版的此书中注释内容并没有像其它电子书那样做成超链接的形式，而是直接夹杂在正文中，并且字体与正文等大，影响了阅读。希望出版社能够重新制作一下
- 32、感谢无私的美人
- 33、大学之道也就在这种校史里看得到了吧
- 34、这本书真的很好看，一口气看完了，觉得身临其境，仿佛就站在历史的那一刻，看着燕大的起伏兴衰，很推荐
- 35、作者陈远说过，在媒体的工作经验让他知道怎么写能让人读起来不累。本书读起来确实不累，但作为学术著作，结构有些散漫，提出了问题却没有足够的分析和结论；作为通俗读物，又显得学究气，语言不够生动灵活。最令人唏嘘的不是燕大的消亡，而是司徒雷登无法安眠燕园。
- 36、翻看该书，第一章居然发现抄袭《燕大文史资料》（第四辑）中王百强先生写的：“燕京大学校名与校史若干史料辨析”一文的内容十分严重。高厚德的《燕京大学史》是英文微缩影印版，王百强先生是摘译的，此书作者竟然完全抄袭王百强先生所引高厚德著作全部内容，还将高厚德的为著作列入书后中文参考文献？？？简直是岂有此理。。。书中插图主要来自燕大80周年纪念册中。。。很多内容基本是摘抄别人引用过的著作和文献，然后作为自己的引文，还假模假式列出参考文献。。。这本书除了最后一章有点看点，其余内容要么抄袭，要么从前人著作摘抄（“假引证”）。。。可以说，没有什么学术规范可言，可以看出此书作者并未受什么学术训练。所以，提醒一些读者读该书时，保持警惕为好。
- 37、值得一看！老师推荐的哦！
- 38、很棒的一本书，内容详实，阅读顺畅。强烈向喜欢民国史的同学推荐。
- 39、最后一章，触目惊心……以及口述史绝对功德无量！
- 40、了解了一下，挺不错的，前有之事只怕后世复有之。
- 41、宣传语俗气一点儿。装帧一般。文字全面，普及性尚可。可闲读。
- 42、一本很全面介绍燕京大学的书，值得细细品味，对照今天的中国的一些大学，很感慨。
- 43、叙事平平，燕大尽管成就很大但文中多有过誉不实之处，比如“世界一流大学”、“没有哪所大学像燕大对政治介入如此之深”诸如此类。更难以忍受的是，作者对北大简直是不怀好意，要知道院系调整以及北大从城里迁入燕园都是当时的政治决定，而不是北大主动为之；对司徒校长安葬燕园一事同样质问北大为何不置一词，简直莫名其妙。
- 44、一个没有百年历史的大学，在一个时代，做了对于现在来想，许许多多牛逼的事情，然后它被历史冲走了。。真遗憾，只能说，历史是复杂的，燕大的精神能留存到燕大每一个人的身上，被流传下去，多棒！
- 45、潞河这个地方原来和燕大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曾经燕大的建筑名称风雅，不知有没有一天能恢复那些称谓。 @陈远
- 46、客观真实的描述那个大师辈出的岁月。
- 47、捋得很清晰，不错的普及读物。
- 48、看到那些湮没在历史里的人名，一阵唏嘘。。。
- 49、夜半读书 想起苏大鸠占鹊巢的前身也是教会学校 想起去过的广州东山近代别墅群 传教士 谢谢。欢迎您再来 常来
- 50、《燕京大学》一书，是作者所著《消逝的燕京》（重庆出版社，2011年）的姐妹篇。为撰写好这两本书，并不断挖掘这一段被尘封的历史，作者曾走访了多位在国内还健在的燕京学人，以及他们的亲属及后人（尚未涉及曾执教于海外的燕京学人，及其后人）；查阅了大量不易见到的，涉及燕京大

学早年档案资料。尽管这些资料并非珍本秘籍，但作者善于从中发现蛛丝马迹，进行合理考证，并提出新的观点。不足之处，对于曾执教于海外的燕京学人，及其后人，如邓喘禹、周一良、王伊同未能记述、描写。

51、历史可以明志

52、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53、1，了解了燕京大学的详细的情况，如：是文理科的学校；是基督教各个差会共同参与举办的原因；学校建立的种种困难等等。2，上世纪二十年代，我国各界有志之士对外国基督教欲想控制中国教育的抵抗及取得的成绩。3，这是一本记录我国教育变革的书籍。

54、【燕京大学很重要，但是这本书写的不好。】（可能叶文心的《疏离的学院》会好点，但这不是专论燕大的。同是民国大学主题，易社强的《联大》就很不错。）

55、材料还算丰富，但是写得未免也太无聊了吧。

56、简要回顾了那段值得纪念的历史

57、燕大校史。就进入中国，中外合作方面，和八十年代大众汽车进入中国可同读并观之。当然，和大众非常不同的是，燕大发展到最后是能够完全成为中国学校的。书的内容侧重人事方面的介绍。正是因为燕大对中华教育的真正担当，才使燕大成为成果卓著的名校。只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58、：

G649.281/7233

1、大学的历史反映一个国家的历史。燕大是中国现代大学史上的一个传奇，它从建立到消逝，存在不过四十年，却曾到达了世界一流大学的高度。而讲燕大的校史，离不开司徒雷登。作为教育的传教士，司徒雷登对燕大，对中国教育的意义甚大。从燕大建立之初的矛盾调解，到确立办学宗旨，选址募款，发扬学术。司徒雷登的一生贯彻着因自由，得真理，以服务的信条。燕大经历了抗战，内战，即使颠簸流离，却一直薪火传承。最后，燕大消逝于院系大调整，分崩离析，让人扼腕。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燕大的精英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大师，那是燕大历史甚至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群星闪耀时刻。在这些大师背后，是博雅塔，未名湖，穆楼，临湖轩。正是燕大的精神滋养了这些大师。在司徒雷登穷极一生建设的燕大，有着自由和独立，严谨和友爱。在燕园，读书和知识分子良知是最重要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当看到老校长司徒雷登不能长眠于燕园，看到那些有气节的老教授和燕大人被批斗被改造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扼腕。一个拥有自由平等的学术环境的地方，怎么会在极端的政治环境下，变成1984。回忆那些逝去的大学，也是在反思我们的大学，反思我们的教育。我们要记得，在1919-1952年，中国有一所杰出的大学，叫做燕京大学，它有一位杰出的校长，叫做司徒雷登。我们还要记得那些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正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坚守，一些燕大人的精神才能传承。

2、我并不熟悉燕京大学。但是燕园是我一生中最无忧的角落。曾经满腹深情地称P大为疯子收容所。最后的疯子，从S城回来的疯子。什么都不剩下，只剩下什么时候都不忘记仰头大笑的没心没肺。它收容了我，又一次。某一年，在红楼电影院附近过夜。P大收容了我。然后是2010年，逸夫二楼五层，一堆化石里的沙发上，得以睡了一夜。无论何时，它都没有抛弃我。再一次地可以进入P大图书馆。是二货纳去了湖人的夏天。我坐在图书馆的教师阅览室里，一点也没想起在S城的是是非非。然后是在P大的半年时间。然后是放手。和昨天道别。再见，曾经爱的人。曾经而已，我们还是大笑大跳，跑到二号位，轻快地甩臂。然后搬走，去了南城。再接着，去南洋。在乌节路上走着，看到周边写着英文字的路牌，眼睛里突然热出了汗。搬家之后，每天都要坐四十分钟公交车回家。明明还有疯子收容所的身份，已经自暴自弃地扮演起正常人。心里想着，燕园的草木深深已经深入骨髓，未必需要那么注重形式。直到翻了这本燕京大学，我才发现自己错了。P大和燕大，完全是不同的魂灵，不过恰巧先后占据那个园子。我所有的自由散漫不求上进，疯子收容所里展现出的快乐与才华，很大一部分都来自燕大。所以当06年毕业时，我不舍的是校园，有些人不舍的则是同学——P大在近些年来展现出的矛盾两面，也是因为两个魂灵寄居一个身体所致。P大是常为新的，积极向上的，团委的，振臂一呼的，GPA的，司法考试的，公务员培训的，国家民族复兴的。而燕大，是燕园的。燕南园的猫。湖上永远的笛声。无用的花神庙。那些飞起的檐角。塔尖滴下的露珠，图书馆屋梁上沉默蹲踞的兽。这才是燕大。这是个体与这个园子的交往。和周围奔跑着去革命，奔跑着去考研，奔跑着去救国，奔跑着去跪求offer的，全然不同。读到关于共同过圣诞节的故事。读到校长给附近社区的孩子写信，请他们来过圣诞。读到校园里的亲情和友谊。书中还有一句，不似P大，学生不住在一起，彼此互不认识。即使两人共住一屋，还往往悬起帘子互不说话。我突然发现，这就P大和燕大，在我身上留下的两重回忆。温情的、软弱的、无用的、散漫的，和强悍精明、寸土必争的。我想起同班女生们彼此憎恨而虚假的笑脸，也想起毕业后处处可见的强蛮无理的世道。我发现我在燕园受教的，两者都有。只是被我授予疯子收容所的，其实应是燕大。不可思议。果然有无数地缚灵，活在燕园草木深深，传递燕大的“负能量”。足够燕大，而不够P大。拜你们所赐，我非常骄傲。

3、" 燕京大学，从成立至其消亡，虽然不过短短三十三载，然而它却走过了国、共两个时代，见证过中国最为艰难困苦的岁月。即使常年深处水深火热之中，也无法阻碍其迅速成为最为出类拔萃的大学，名气之大，迄今亦无人能出其左右。作者在书中说到，关于燕大的历史档案，今天也依然未能揭去“保密”的烙印，一般人是无法从正式的文书档案中了解到它的全部的。对于它的记忆，已经随着作古的老人们一起被渐渐遗忘。作为曾经为中国社会发展起到巨大促进作用的燕大，不应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能够重新检视燕大从艰难诞生到蜚声海外再到嘎然而止的全历程，对于中国教育能否再续“一流”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之所以说是“再续”，那是因为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燕大就已达到了当时一流的标准。即使是带有教会大学的名号，但也完全不妨碍燕大的全面发展，从大学的管理体制上，到学术研究成果，再到实践领域，燕大都独领一时风骚。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浸染于燕大厚重的人文与学术氛围的学者和仁人志士的良心、决心和铮铮铁骨的。尤其是

在那个国将不国的乱世，他们依然践行着自己对民族、国家甚至对世界大同的责任。能有如此气节，不得不让人佩服——当下中国的大学教育，发展至今却盛行着以个人利益为导向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盛行，孰优孰劣，不言而喻。时至今日，燕大的威望与成就，仍让后世大学难以企及。然而象牙塔内的学术自由与思想开明，却拗不过领袖铁一般的意志。原本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圣地，霎时间沦为政治运动惨烈的第一线。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伴随着中国千年的教育传统被全盘否定，由洋人创办的燕大，即使拥有过无限的风光，即使为中国社会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但亦难逃被推翻、肢解的厄运。所幸的是，燕大之精气神虽亡，但其形骸残在，被并入其他大学后还能延续其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作为曾经的最高学府，燕大的消亡无疑是文明衰退的一种表现。过去的不安与动荡，早已尘埃落定，中国社会发展至今，已是一派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说到成绩，人们总是会沾沾自喜，信心满满。但对于发展路上的那些曾经的不尽人意，却不是谁都愿意提及的。燕大的历史，被人铭记住的多是它光辉的那一页，而那段包含了无奈与嗟叹的岁月，却被刻意地封存、遗忘。如果没有这本书，我对燕京大学和其他教会大学的认知，唯有通过百度获得，必然只停留在那光辉的部分随波逐流地跟着沾沾自喜、信心满满起来，绝非此刻的沉重与感伤。之所以感到沉重与感伤，是因为国内高等教育发展至今，的确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又多少丧失了其“为学”的精神内涵，变得如工厂一般量化产出一批合格工具的场所。这还不算，各种曾经备受尊敬的称呼也能明码标价叫卖起来，专家成了“砖家”，教授变为“教兽”。用博大精深的汉字去戏谑，还不能说明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乱象、怪象嘛？感谢作者陈远的这本书，让我能伴随着他的文字，重回燕大那段峥嵘的岁月，再次领略和燕大一起逝去已久的“大学”精神！

4、消失了的燕京大学《燕京大学1919-1952》提到燕京大学我们都知道，也知道现在的北大占的就是当年燕京大学的校园，可是却很少有再深入了解燕京大学的机会。毕竟燕京大学已经消失了六十多年，毕竟这是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所以被遗忘也是很正常的。前几天刚看过一本书《北大向左清华向右》，里面详细地介绍了清华和北大两所学校，看介绍清华的时候感觉特别好，可是看到介绍北大就感觉有点不到位的感觉。现在想起来，一下子明白过来，原来我们在北大校园中，看到的都是燕大的影子，未名湖、博雅塔、贝公斋、临湖轩、图书馆、男生女生两座体育馆，这些都是燕大留下来的啊，所以写北大的历史就和这里的建筑联系不上，北大最辉煌的时候是在城里沙滩的红楼和京师大学堂啊！看了这本书，以前了解到的很多关于燕京大学的碎片就都一点一点拼接上了，一点一点在我的眼前出现了燕大完整的形象。燕大是由汇文学校和华北协和加上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合并而成的，当年的教学学校都是由各个教派出资兴建的，从小学一点一点发展成中学，然后又一点一点发展成大学，不过规模都非常小，条件也很简陋，一般只有几个教师，几十个学生。所以合并起来才能够形成有规模的真正的大学。当年北京的三所学校就这样走向了合并，这个过程也充满了曲折，好在目标是一致的，最后定名为燕京大学，校长为司徒雷登。当年的校舍并不在海淀，二十年代学校成立以后才开始买地建设海淀校园，1929年才搬家，不过这里是中国最美丽的校园，过去是，如今依然。当年中国一共建成十七所大学，燕大是最著名的一所，燕大培养出来的人才有冰心、费孝通、周汝昌、王世襄、谭其骧、孙道临等等，教授的阵容更加宏大：埃德加·斯诺、雷洁琼、吴文藻、江平、冯友兰、张东荪、钱穆、顾颉刚、邓之诚、萧公权、周作人、郑振铎、冰心、冯沅君、陆侃如等等。解放后燕大有50多人成为两院院士，虽然总数不是最多，但是如果按照毕业生人数的比例看就超过了清华和北大。燕京大学的成功和司徒雷登分不开的，燕大是司徒雷登一手打造出来的，司徒雷登对燕大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蔡元培对于北大，梅贻琦之于清华。司徒雷登为燕大几乎每年都要去美国，去募捐找来了雄厚的经济支持。并且和哈佛大学取得联系，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是燕大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燕大的历史也许我们百度一下就可以知道，从合并到海淀，从海淀到日占时期，然后是解放战争和解放后，直到抗美援朝，在院系调整中燕大就此不复存在。不过历史的精彩都在细节当中，想要了解燕大，还是好好读读这本书。

5、1. 写史的最高状态就是微言大义。最可喜的是作者没有以受害者的姿态或者宗教主义者的态度来写这段历史。无谓的拔高，最后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对立，留下的思考的余地相对会少。反而是平淡的讲述，会成就一段悲壮背后的微言大义。2. 转折点终究是存在的。无数人的会说，转折点上面，政治运动是最大的推手。陆志韦先生身上的故事或许可以找到运动之外的原因。陆先生很大程度上要的是独立性，要的是中美在办校政策上合作并且对立关系中的权威性和话语权，“而不是纽约托事部的幌子”（p205）。恰恰新政权可以给予他这一切，双方一拍即合。独立性，无疑具有很大的诱惑，一方面是更大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意味着自身权威的产生。而获得独立性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3.

在人类进步的空间里，是不是都是断层状态的，是不是每一次跨步都要和过去彻底的割裂和清算。我们如何在独立的过程中，完成对历史的反省，而不是决裂式样的“背叛”。在完善自我的过程中，持续性的保持对自己和对历史的忠诚。鉴于中国的历史趋势都是回旋式，也许问题的意义就在于此。

6、原谅我的孤陋寡闻，在看这本《燕京大学》之前，我一直把燕京大学当成了北京大学的前身，只是后来改了名字而已。但无论是燕京大学还是北京大学，在我心目中都是国内的一流大学（只是所处的时代不同而已），去年因为错失去北京大学培训的机会而耿耿于怀，今年有可能去另外一所国内高校培训，也在真心期待。大学，不仅仅是高中毕业生再去深造的地方，更是几乎所有中国人的“一个梦”，这个梦想甚至可能承载着几代人的期盼和希望。我读的大学没有名气，很一般，有个讲外国文学的老师每次上课都鼓动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去大城市的有名的学校深造，当时我不以为然，还觉得偏安一隅过着平淡的生活更好，工作这么多年也有了新的想法，虽然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不一样，但是“大学梦”每个人都有，有的是实现了高兴之，而如我这样的是因为自己无法进入而阿Q而已。翻看这本密密麻麻记录燕京大学点滴的《燕京大学》，为作者严谨的写作太多所折服，作者花费大量精力，搜集整理了有关燕京大学的各类史料，从燕京大学的成立到司徒雷登校长如何网罗人才，一步步让燕京大学发展成为闻名国内外的搞笑，再到燕京大学历史上有名的教授、人物的相关介绍，无一不客观、真实、详尽，读着读着真有种置身当时历史情境的错觉。司徒雷登，在我的脑海里只有伟人写的那篇《别了，司徒雷登》斑驳印象，而作者陈远将这位在燕京大学的发展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进行了“浓墨重彩”的介绍，从燕大的大家长，到北洋时期政坛上的活跃，再到他与国共两党之间的各种历史事件，直到他出任大使永远离开燕园，勾画了这位重要人物与燕大的那些事儿，从一个教育家到政客的轨迹。一个知名的大学，不仅仅是学生学习、学术的地方，更是有着深厚的历史、社会甚至是政治背景，特别如燕京大学这样特殊历史条件下诞生的，更是与政治、与历史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燕京大学作为西方文明介入我国文明的象征，期间与中国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发生剧烈冲撞，所呈现的发展形态，更是折射了近现代中国的命运。

7、美好的东西毁掉，总是令人无尽的惋惜；辉煌的经历过后，总是让人长久的怀念——比如燕京大学，一所曾经存在，又永久消逝的，在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声名显赫的大学。燕京大学，这样一个极具中国意味的名字，却是一所由西方人兴办的教会学校——由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与北京汇文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合并而来。而它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则是另外一个更具知名度的名字——司徒雷登，因为在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被辛辣讽刺而家喻户晓。从1919到1952，燕京大学只存在了短短的33年时间，但这却是多灾多难，跌宕起伏、始终在生死存亡关口挣扎的33年。从宗教冲突、学生运动、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最终在院系调整中被一分为八的肢解……它经历了五四运动以来所有的苦难，见证了每一步的足迹，是如此之深的介入了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各个角落，它的历史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陈远方才选取了燕京大学作为研究对象。他说，他并不是要写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校史，而是试图通过叙述燕京大学在这33年历史中所遭遇的困境，所进行的调适，所尝试的突围，以及被撤销的过程，来反映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在不同时期所面对的问题与困境，以展示中国在东西方文明冲突下的紧张与挣扎，进而折射出整个近现代中国的命运。但是，我不是学界中人，在阅读的过程中并没能很好的领会陈远这种以小见大的写书意图，而是从他对燕京大学历史的叙述中，深刻的理解了燕京大学作为一所教会学校，是如何在从1919到1928这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战胜种种困难，突破重重困境，迅速从名不经传强势崛起，一跃成为一方学术重镇，进而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的。燕大是如何成功的呢？这可能有多种因素，但最首要的一点，是与司徒雷登是密不可分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合二为一的。作为首任校长和长期以来的实际掌控者，他一手塑造了燕大。他负责与美国托事部沟通，争取更多的办校自主权；他负责到处筹款，与中国、乃至世界名流交往，为学校发展争取资金；他在燕大内部营造了一种“燕大一家”的宽松的学术氛围，甚至亲自邀请教职员工的子女开展活动；更重要的是，他主导确定的“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真正成为燕大人的精神信仰；同时，他对燕大的发展有着清晰的定位，始终不遗余力的淡化燕大教会大学的背景，推动燕大中国化、世俗化，使燕大从为上帝服务变成为中国服务，深深融入了现代中国。燕京大学又到底有多成功呢？1928年美国加州大学对亚洲高等院校的学术水平进行调查，燕大被列为全亚洲最好的两所基督教大学之一，并认定燕大的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美国的研究生院攻读学位。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则是至今仍在运行的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它使得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可以相互派遣研究生和访问学者，这意味着燕大的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哈佛深造。它还与美国密苏里大学合作办起了中国的第一个新闻学院，密苏里——燕大新闻学院

；它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家的摇篮，它培养了一大批在现代中国响当当的人才……不管是以当时的标准判断，还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燕京大学作为“教会大学之首”、“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都是不容置疑的。而2013年，在英国《泰晤士报》所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国排名最好的是香港大学，位居35名，北大46名，清华52名。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在实力远胜往昔的近百年后的今天，中国没有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先生1931年在清华大学的就职演讲中的话至今振聋发聩，让现今的那些热衷于建高楼、建校区的大学校长们、政府官员们汗颜！燕京大学在其33年的生命历程中，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也创造了诸多的辉煌，达到了中国大学前所未有、后仍未及的高度。它在1952年被拆分是一个令人非常惋惜的事件，但相对于此，我们可能更应该从燕大的历史中找到兴办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这才是对当下最具启示意义的事情。

8、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迁入燕京大学校址，燕大被分拆，自此创办于1919年拥有33年校史的燕京大学成为历史名词，后来有关燕大的回忆文章，许多都使用了“消失的燕京大学”的说法，燕京大学真的消失了吗？在读完陈远著《燕京大学1919—1952》后，有一个强烈的感觉，燕京大学仍然存在，并且永远不会消失。这么说不仅是因为接纳了分拆后学系的北大、清华、民族大学、政法大学等，不同程度地传承了燕大的精神与文化，更是因为作为中国大学历史上一个辉煌的存在，燕大的名字并没有因为时间的磨损而黯然，反而在大学精神逐渐沦丧、许多大学生看不起母校的今天，有着熠熠闪光的示范效应。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个问题一直萦绕，“他们为什么如此热爱燕京大学？”整个阅读过程也成了寻找这个问题答案的过程。从最狭义的角度理解，美国教会当时在中国创办多所教会学校，主要目的是培养神职人员，让基督教在中国落地生根，从二元对立的角度看，也可以偏激地理解为“信仰侵略”，在整个燕大从筹建到壮大再到被分解的过程中，“信仰侵略”都是一个巨大的阴影，“谁出钱办学”成了大学的原罪。然而，用今天开放的眼光看，“谁出钱办学”并不是什么问题，关键在于要办一所怎么样的学校。校园与学子之间，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热爱母校本身，也成为了一种信仰。《燕京大学1919—1952》描述了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通州协和大学这三所学校合并为燕京大学的艰难，大家都希望新学校名字能有原校名出现，甚至为此不惜“大吵三天三夜”，有学生要以焚烧毕业证书来进行抗议，他们如此热爱母校，是因为那时的大学之于年轻学子而言，融合了学习知识、寄予理想、提升精神、刷新生命等诸多功能。创办者的辛劳自不必说，但只有被学子用赤诚之心来守护的大学，才是一所优秀大学的根本。作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也是最重要一位校长的司徒雷登，在创办、发展和保护燕京大学方面，付出了呕心沥血般的努力。他的最可敬之处，不在于向美国老太太（教会资金主要捐赠者）伸手要办学经费，也不是巧妙周旋于政坛人士、社会名流中间为燕大保驾护航，而是利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策略，更改了教会办学的主旨，把燕大带向了“因自由，得真理，以服务”的现代大学之路，这句校训每个字都能在教会那里找到渊源，但在今天看来，却是世界主流价值观的体现，是每个公民毕生追求的理想境界。

司徒雷登热爱燕京大学，一方面是出于情感投入良多的缘故，另一方面是他对大学有着超越国别、政治、文化的认知，他办学的动力也许用四个最简单的字就能形容，这四个字即“教书育人”。花高薪请名教授，以中国古建筑风格建设教室、宿舍，如鸟筑巢般地让燕大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成为当时的世界一流大学，若非有涓涓不断的热爱来支撑，会无力完成。当时落后的中国，对于学生教育举国上下都有强烈热情，军阀陈树藩把北京居所勺园送予（一说低价卖出）给燕京大学当校址，也是看中了燕大的“品牌号召力”，弱国更要重教育，连军阀都有此觉悟，可见当时办学承载了多大的民族复兴愿望。司徒雷登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只想办一所中国大学，至于燕大的西方渊源，他觉得只有谈到历史时才有必要提到。燕大之所以在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这两次冲击下仍能安然无恙，和司徒雷登对待燕大的诚实态度有很大关系，当燕大壮大时，已不是他一个人、一个教会的燕大，而是中国人的燕大。最后燕大还是因为另一性质的收回教育权运动而被分拆，这是拘于当时历史局限的无奈结果，后来有声音呼唤“恢复燕大”，也只能当作对燕大的一种怀念来看待了。《燕京大学1919—1952》是一本通过采访燕大校友以及研究史实资料而写出的读物，文字客观冷静，但读时仍偶有激动之感，这激动有些来自本书始终如一的历史观：摒弃各种外在杂音，坚持对大学精神进行纯粹的还原。有些则来自对照现实后产生的失落情绪，为什么现在的校长、教授和学生，对大学的看法变得如此功利？他们对大学的热爱为何不再那么纯粹，大学为何又沦落成了求职跳板甚至复杂社会的浓缩地？对旧日大学的怀念潮，这些年集结出许多让人感慨的著作，阅读它们，方能真正了解大学的含义。（刊于8月9日《北京青年报》）

9、『小语的碎碎念』我大概是不能算是一个好的书评人。凡是触及与己相关，所写评论便会显得太

过主观，十分感情用事。然而私下里却也觉得，作为一名普通的读者，能遇上一本书，让你产生这样多的思考，已是件十分幸运的事情吧。』道不清缘由，这段历史总是让人心潮澎湃。而此间的文化、大学，更是让人魂牵梦萦。在大学精神逐渐沦丧的今天，这样一本材料丰富、视角客观的燕京大学校史，无疑在让人更加清楚的认识和了解燕大的同时，加深着内心的怀旧情怀，以及对时下大学教育的反思。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如此刻薄的去评说当下的大学教育，我似乎是没有资本的，毕竟我正接受着这样的教育，也从中有所收获；然而也恰恰是作为一名当下的大学生，对大学才有着更深的的情怀和更高的期待；也真真切切目睹了、我们当中的大多数耽于享乐，那些耳语相传的“叫兽”事迹或亲身体会，学术造假和腐败，“唯利是图”的所谓“社会精英式”教育……太多太多，让大学生开始“看不起”大学，让儿时心中的圣地撕破梦想。提到这些，这样的新闻我们几乎随处可见：面对内地优秀学生纷纷舍北大清华转投香港高校的情况，人们发出了“北大清华沦为二流”的惊叹。而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对中国高校“唯利是图”的“炮轰”更令众多内地高校颜面扫地……很多人说，如今大学的畸形是由“一切向钱看”的社会状况所决定的。社会环境，对大学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一点我十分赞同，毕竟大学无法脱离于社会而存在；然而，大学教育不同时也是为了更好的独立的个人、更好的社会吗？“社会坏掉了，所以大学教育不得不坏啊”这样的说辞，不过是悲观主义者的借口。无论社会环境如何糟糕，我们的大学，都是可以很好的。而燕京大学的校史，便是对此最有力的回击。从一九一九年正式建校，到一九五二年燕京大学的消亡，这短短的三十三年间，它经历了五四运动、西安事变、国共内战……燕大一隅，真真折射了整个近现代中国的命运。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燕大崛起的学术造诣、燕大的精神，依然影响了不止一代人，真正体现了大学之大，也造就了无数大师。和平环境里，大学的处境，难道会比战争年代更糟糕吗？知识产权法的老师曾讲过一段话，让我印象十分深刻，大抵是在说：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可悲的现象，你们在经历了炼狱般的高三之后来到大学，大一在突然轻松下来的环境中懵懵懂懂一年，几乎难有所获；大二在慢慢进入大学状态的同时，也在宽松的环境中慢慢丧失着自制力与求知的渴望，等到大三逐渐成熟之时，发现似乎该考虑求职或考研事宜了；然后你们的大四，要么挑灯苦读备战考研，要么奔波于人才市场寻觅饭碗——可能最后找到的工作还与你的专业完全无关，你突然回头，看到一群毕业于技术学校的年青人，掌握着你更加娴熟的工作技能，而自己几乎是废物一只。最后老师问，我一直在想，难道大学的四年，不该是广泛学习知识、享受爱情、收获友谊的四年吗？可你们的大学如今只有三年，而且大多是迷茫空虚的三年；在第四年，你们感受到的是生活的残酷，而此前你们也不曾享有大学的美好。只是简单的陈述罢了，却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大学，在予以人生技能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一个精神品格的塑造吧？我是这么认为的……不然，仅为生存的话，认真去学习一门实用的技术，岂不是更可靠吗。我并不否认物质的重要性，反而觉得不管对任何人来说，能够得以生存的衣食都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对大学，我有着更高的期待。只是，在谈及此期待时，我也常常沦为同学朋友或是亲朋之间的笑话。于此也只能回之以无奈的苦笑。我们的物质生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提高着；而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精神生活的匮乏，也是触目惊心的。在自媒体日渐发达的时代，人们有了更多发言机会的同时，也暴露了这个社会有相当一部人的三观几乎都还停留在封建社会——这并不夸张，而更可悲的是，能够熟练运用自媒体谈吐江山的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恰恰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诚然，社会环境会影响教育，而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则是改善社会环境的希望。若放弃之、任之由之——及此不知该如何继续行文，如今即将毕业，只能在心里默默地、苦涩地道一句，别了，大学。

10、对于《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我还是有印象的，书下的注释只是提到了他当时是美国大使，而对于他在教育上的贡献，则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而这本《燕京大学1919-1952》无疑使他在历史册页中的影像更加丰满了。作为一所基督教会出资兴办的大学，燕京大学并没有成为基督教的传播站，反而造就一大批有益于中国发展的杰出人才。这和司徒雷登开放的办学思想是分不开的。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我所要求的是使燕大继续保持浓厚的基督教气氛和影响，而同时又使它不致成为（哪怕看起来是）宣教运动的一部分。”因为他热爱中国，熟悉中国的文化氛围，他知晓唯一能够改变中国人对文化的态度的方式不是强迫而是通过渐染而达到认同。他一方面从基督教会争取资金，一方面以开放的姿态去办一所具有世界思想的大学。如何办好一所大学？这个问题即便是在今天也是一个很难以遽然回答的问题。不过我们可以从燕京大学严格的学分制度上获得一些启示。在燕京大学，“每门课程的评分标准为六个等级：优秀、良好、中等、及格、可参见补考的不及格和不可参加补考的不及格。之后不可参加补考的不及格这一等级被删除……但其严格标准并未下降”正是这种宁缺毋滥的严格标准，使得燕大拒绝了很多裙带子弟，也使得燕大的学生质量得以显著提升，从而使燕大的

毕业生大多在日后成为了响当当的人物。此外，为了保持学校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师生之间的密切关系，司徒雷登一直注意保持比较低的师生比例。这种做法无疑是把现代的班级授课的教育形式与传统的学徒制的教育形式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通过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让学生明确自己的治学方向，而通过与教师的和谐相处让学生学习教师身上的人格魅力和治学态度。反观现在的授课制度，无论从小学到中学再大学，教师的疲于讲授与学生的苦于记诵的状态，与当年的燕大相比，所能创造的价值真是不可以道理计的！1919-1952年是一个动荡的年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相继在这段时间内出现。可以说，燕京大学经历了一段风雨飘摇的岁月。然而，燕京大学所培养的学生并不是关门读书的书呆子，而是积极参与救国救亡活动的爱国青年。1934年司徒雷登重返燕大，在面对刚刚为反抗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而南下请愿归来的学生，说：“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么？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新！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后来他又以美国的历史，像燕大学子说到“苟令今日之中国学生在国难时期中而不谋救国之道者，则国家也至无希望也。”在抗日战争时期，燕京大学以其美国的背景，独立于日本占领军的管辖范围之外，成为了一片保护中国学子的一片净土，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很多爱国学生的保护伞。而在解放战争时期，燕大的师生也为和平解放辛勤奔走。……然而这个曾经以其特殊背景而维持独立并为社会做出一定贡献的大学，最终随着政治关系的变化而消亡，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更值得叹惋的是这段历史随着岁月的流逝，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幸亏有陈远先生和他的这本著作，我们才得以看到了许许多多发生在燕京大学中的鲜活的影像。

11、第一次读一个学校的校史，收获颇丰，正如作者所言，他写的并不是一部严格的校史，而是要关注它的独特之处。尽管作者说他放弃了“燕京大学自身演变的轨迹，以及它在中国教育史、学术史、政治史乃至社会史中发挥的作用和位置”这个宏大的目标，但事实上，这本书仍然可以看作是以燕京大学校史为主线，教育史、学术史、政治史为支线的文章。书中有许多书摘、史料、当事人回忆等内容的引用，用以佐证或是叙述当时发生的事，其中不乏一些逸闻趣事。燕大新址的选定和购买过程就很耐人寻味，陈督军将给父亲购置的晚年用来养老的勺园让与司徒雷登，作燕大的新址，也就是后来所称的燕园，这一来历背景使得燕园的故事更是别有一种情怀，本是尽孝心，现在让予了教育事业（尽管在当时还谈不上），无论如何都是一段佳话。燕园的美不仅在于它承袭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更在设计时的别具匠心，建筑不是随意点播平地而起，而是精心设计了轴线与分布。更雅的是，每一座建筑都有它的名字，由此成就了现在的未名湖与博雅塔。其实最耐人寻味的，便是在燕京大学消失后的那么多年中，它却仿佛从未消失过。读到学术上的崛起一章，看到当时燕大历史系教师阵容不禁咂舌。几乎每个人在现在的人眼中，都可以称得上学术界的大牛，其中有好几位都是燕大历史系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值得思考的就是，为何燕大可以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学生，又为何许多燕大的学生至今难忘那段历史，难忘对母校的一份情深？在现代大学教育中，学校的好坏优劣似乎是被框死的，好的学校几乎是样样好，而不好的学校似乎也甘于沉寂，一无所成便一无所成，学生也很少会以母校为荣。燕大在它还是以为基督教服务的时期的教育排名并不靠前，但它靠着校长司徒雷登的努力和教员的严谨，也慢慢打开了新的教育领地，培养出优秀的学员。教育工作者必须有一种有别其他行业的情怀，如同企业文化，独特的校园文化是成就一个学校的关键，我始终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即使是默默无闻的三流学校，若是真心想要办好学，在众平庸大学里杀出一条血路，也是未尝不可的事情。

12、雨天，收到陈远的《燕京大学》有些惊喜，竟然是本毛边书。可惜的是，没有折进去的勒口，在没有衬托的情况下一路颠簸到厦，弄皱了，心疼得我要死。即刻用岳南的《南渡北归》大部头压勒口，希望有所缓解。当晚，在手边没有割纸刀的情况下，大阔步地翻阅《燕京大学》，倍感此书的珍贵。找寻失去的大学，重建教育的道德底线。早在2005年5月出版的，由陈远编著的《逝去的大学》中，首篇陈远就谈到燕京大学的第一位校长司徒雷登，称他为燕京大学的灵魂。这位出生于杭州的美国人，在中国不仅仅是一位传教者，更是一位教育家。而他的晚年，却承担了美国对华政策失误的替罪羊。他生活了50年并深深爱过的土地，在1949年8月也对他发出了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现在的大学教育，与以往大学教育有很大的不同。一是教会大学的消失，二是私人书院的消失。教会大学的消失，《燕京大学》是一例。过去，我们单纯地把教会大学当作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因为它是为基督和教会服务的。读陈远的《燕京大学》，我们能够很好地明白，教会大学更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能忘却的一部分。更何况，正是院系调整中被撤销的教会大学，把现代教育模式和女子教育带入了中国，对近代中国科技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非

常积极的作用。陈远的《燕京大学》第一章即交代了燕京大学的诞生，是由美国教会在中国创建的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协和大学及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于1919 - 1920年合并而成的。1926年迁往海淀燕园以未名湖为中心的新校舍，即现在的北京大学所在地。也就是说，现在的北京大学所在地，就是曾经的燕京大学。难怪2005年连战访问燕园，演说中深情款款地谈到毕业于燕京大学宗教系的母亲，20世纪30年代在那儿接受教育，进修成长，度过年轻的岁月。光读联合前的三所大学的诞生，就让我心生感慨。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的前身是贝满女校，1864年的首批学生，是由在北京街头乞讨，被苏格兰独立传教士威廉·彭斯救来的三名小女孩，和另外两个女孩组成。所以叫贝满女校，是因为学校由贝满夫人赞助。贝满夫人的丈夫是第一个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1861年去世。华北协和大学的前身是潞河书院，是一所寄宿学校，主要接受来自基督教家庭的男生，由美国公理会的另外一名牧师江戴德组建。而汇文大学的前身则是美以美会于1870年在北京开办的一所小日校，当时只有一间小教室，仅有的三名男生还是靠每天提供一餐膳食吸引来的。然后发展成一所寄宿学校，又升级为中学，1988年阜查理会督访问学校时，决定将其建成一所大学。在并入燕京大学之前，汇文大学已经设立了以下院校：文学院、理学院、神学院、医学院、预科、工艺学校等，是联合之后的燕京大学的主体。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贝满夫人、江戴德和美以美会开办的三所学校，就是燕京大学的起源，这样的组合也是不容易的，有着这样那样的历史原因和契机，也凝结着许许多多人的心血。陈远的《燕京大学》，从燕京大学的初建，讲到1952年的高等院系的调整，燕京大学的退出，33年的历史，那么年轻，却在翻天覆地中消亡。作为燕京大学的创办人，司徒雷登留下遗言，希望他的骨灰由一直陪伴他的秘书傅泾波带回中国，安葬在他撒过汗水的燕园。这个愿望却一直没有实现。历史的原因一个又一个。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才入土杭州，入土他出生的地方。

13、中国目前最为著名的学府应属清华、北大，但他们在英国《泰晤士报》2012—2013年世界大学排名中，北大（46名），清华（52名）。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世界大学五百强排名中，北大、清华同列在第151—200名的区间内。2013年，香港大学从北大、清华手中抢到16名省市状元。香港大学世界排名以第35名超过清华、北大。中国要想创办一所世界级的一流高等学府，目前为止比较难。但61年前，我国就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存在过，那就是燕京大学。但遗憾的是，它已经消失了61年。燕京大学，在短短32年的时间就在首任校长司徒雷登的努力下，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为什么这样一所大学却消失了呢？读完《燕京大学》让我对这所大学的创办、发展、成熟、消失有了一个详细的了解。真要感谢作者陈远，他为了完成这部著作，十年前就开始着手准备，采访了二三十位燕大的老师和毕业的学生，他们都已经成为耄耋老人了，直到这本书出版，又有很多人离世。一个著名的高端文化的记者、编辑，能把目光锁定在燕大，能让我们了解燕大的历史，不能不感谢他。北大的校址原来就是燕大的校址啊！我是那么喜欢北大。试想如果燕大发展到今天，那该是一番怎样的辉煌。燕大的发展离不开司徒雷登的倾心付出。原本是教会学校的燕大，在校长司徒雷登的主抓下，既得到与美国教会的支持，同时适应了中国国情。他有长远目光，召集一些有学识水平的中外名家指教，洪业、斯诺、胡适、吴宓、闻一多、冯友兰、许地山、熊佛西、陆志韦、郑振铎、周作人、朱自清、金岳霖等。他能够接触各级各类人物，包括蒋介石，包括一些商人，包括政界一些要人，在反教会热潮中，燕大能够摆脱其它教会学校的命运，就是因为它的与时俱进。他与世界知名学府建立了交换教授和学生的制度。中西教授同堂讲授，来自各国的学生同堂受业，熔中西文化于一炉。司徒雷登还取得美国霍尔基金会资助，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为中美学术交流，选派留学生提供资助与奖学金。所有这一切让燕大迅速成长。遗憾的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的一切成为我们的模板高等教育领域也按苏联模式实行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一分为八，各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师大、民族大学、政法学院、财经学院、音乐学院和中央劳动干校，校园则被北京大学接管。从此，燕京大学在中国消逝。遗憾一直萦绕着我，为什么这样一所好的学府，就容不下它的存在？难道仅仅因为与美国的关系紧张？难道仅仅因为我们是无神论者？为什么这样一位伟大的校长，他最后的遗愿都不能如愿，连埋葬在燕大校园里的愿望都无法满足？这些遗憾是无法弥补的！好在有这样一本书，让我们知道了中国曾经有这样一所学校——燕京大学。

14、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虽然中国有古老的书院传统，但现代大学却是典型西方文明，准确的说，大学本是中世纪欧洲教会进行学术和思想研究的机构。燕京大学——一座由美国传教士创立的大学，诞生于五四启蒙运动中，在战火中成长，最后被枪杆子的新政权肢解消灭。燕京大学和无数“燕大人”的坎坷命运何尝不是一个文明中国的不幸遭遇，这就是历史的细节。

15、韩浩月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迁入燕京大学校址，燕大被分拆，自此创办于1919年

拥有33年校史的燕京大学成为历史名词，后来有关燕大的回忆文章，许多都使用了“消失的燕京大学”的说法，燕京大学真的消失了吗？在读完陈远著《燕京大学1919—1952》后，有一个强烈的感觉，燕京大学仍然存在，并且永远不会消失。这么说不仅是因为接纳了分拆后学系的北大、清华、民族大学、政法大学等，不同程度地传承了燕大的精神与文化，更是因为作为中国大学历史上一个辉煌的存在，燕大的名字并没有因为时间的磨损而黯然，反而在大学精神逐渐沦丧、许多大学生看不起母校的今天，有着熠熠闪光的示范效应。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个问题一直萦绕，“他们为什么如此热爱燕京大学？”整个阅读过程也成了寻找这个问题答案的过程。从最狭义的角度理解，美国教会当时在中国创办多所教会学校，主要目的是培养神职人员，让基督教在中国落地生根，从二元对立的角度看，也可以偏激地理解为“信仰侵略”，在整个燕大从筹建到壮大再到被分解的过程中，“信仰侵略”都是一个巨大的阴影，“谁出钱办学”成了大学的原罪。然而，用今天开放的眼光看，“谁出钱办学”并不是什么问题，关键在于要办一所怎么样的学校。校园与学子之间，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热爱母校本身，也成为了一种信仰。《燕京大学1919—1952》描述了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通州协和大学这三所学校合并为燕京大学的艰难，大家都希望新学校名字能有原校名出现，甚至为此不惜“大吵三天三夜”，有学生要以焚烧毕业证书来进行抗议，他们如此热爱母校，是因为那时的大学之于年轻学子而言，融合了学习知识、寄予理想、提升精神、刷新生命等诸多功能。创办者的辛劳自不必说，但只有被学子用赤诚之心来守护的大学，才是一所优秀大学的根本。作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也是最重要一位校长的司徒雷登，在创办、发展和保护燕京大学方面，付出了呕心沥血般的努力。他的最可敬之处，不在于向美国老太太（教会资金主要捐赠者）伸手要办学经费，也不是巧妙周旋于政坛人士、社会名流中间为燕大保驾护航，而是利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策略，更改了教会办学的主旨，把燕大带向了“因自由，得真理，以服务”的现代大学之路，这句校训每个字都能在教会那里找到渊源，但在今天看来，却是世界主流价值观的体现，是每个公民毕生追求的理想境界。司徒雷登热爱燕京大学，一方面是由于情感投入良多的缘故，另一方面是他对大学有着超越国别、政治、文化的认知，他办学的动力也许用四个最简单的字就能形容，这四个字即“教书育人”。花高薪请名教授，以中国古建筑风格建设教室、宿舍，如鸟筑巢般地让燕大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成为当时的世界一流大学，若非有涓涓不断的热爱来支撑，会无力完成。当时落后的中国，对于学生教育举国上下都有强烈热情，军阀陈树藩把北京居所勺园送予（一说低价卖出）给燕京大学当校址，也是看中了燕大的“品牌号召力”，弱国更要重教育，连军阀都有此觉悟，可见当时办学承载了多大的民族复兴愿望。司徒雷登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只想办一所中国大学，至于燕大的西方渊源，他觉得只有谈到历史时才有必要提到。燕大之所以在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这两次冲击下仍能安然无恙，和司徒雷登对待燕大的诚实态度有很大关系，当燕大壮大时，已不是他一个人、一个教会的燕大，而是中国人的燕大。最后燕大还是因为另一性质的收回教育权运动而被分拆，这是拘于当时历史局限的无奈结果，后来有声音呼唤“恢复燕大”，也只能当作对燕大的一种怀念来看待了。

《燕京大学1919—1952》是一本通过采访燕大校友以及研究史实资料而写出的读物，文字客观冷静，但读时仍偶有激动之感，这激动有些来自本书始终如一的历史观：摒弃各种外在杂音，坚持对大学精神进行纯粹的还原。有些则来自对照现实后产生的失落情绪，为什么现在的校长、教授和学生，对大学的看法变得如此功利？他们对大学的热爱为何不再那么纯粹，大学为何又沦落成了求职跳板甚至复杂社会的浓缩地？对旧日大学的怀念潮，这些年集结出许多让人感慨的著作，阅读它们，方能真正了解大学的含义。（刊于8月9日《北京青年报》）

16、“大学的历史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对待大学的态度反映一个国家对待文明的态度。”对于中国来讲，大学是一个舶来品。虽然可追溯到晚清，毕竟是个洋玩意，自始至终也是在用祖宗留下来的那一套东西来对待它。作者在扉页上写着大学“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反映一个国家对待文明的态度”，其实更确切的说是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一个民族的文化态度。《燕京大学1919-1952》看后让人感觉到沉重……国人自古好置地，至今尤甚。在书中也可以读到司徒雷登的褒扬，在建校初期穷的叮当响的时候，“中国人一直在忙于用他们的资金去购置地皮，并根据自己的意图在修缮那块地皮上的房舍”。虽然工于营建，可是燕京的中国式布局也非出自国人手笔。一批基督教徒，因着信仰，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怀揣着“为基督教服务”的目标，他们创办了各类的学校。在这块有着“武训兴学”等传说的土地上，他们做着与传说相媲美的事情。“我每次看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换句话说，我是在街头演戏的猴子，鲁斯是摇着风琴，等着猴子演完戏向观众要钱的乞丐。”然而兴学的筚路蓝缕并没有让先驱们将学堂变为一己之私，而是本着“因真理，得自由

，以服务”的宗旨办学。“学生毕业时能成为教徒固然好，即使没有接受洗礼，也能对教会有好评，对母校有感情”。教会大学的最终目标是“中国化的基督教大学”。按照文中司徒校长的表述，也可以理解成这样，教会大学要达到的目标是一个受人欢迎的大学，一个被社会公众所承认的大学，这所大学的存在不依赖于西方的条约，也不需要美国的保护。可是，就像一部电影中说的，司徒校长显然“猜到了开头，却没有猜到这结尾”。尽管司徒校长是一个出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传教士；没有哪个传教士能像司徒这样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可是中国人的某些司徒了解毕竟还是不多，或者说司徒毕竟还是个外国人。按照书中的描写，司徒真的是一位好校长，他亲近学生，主持婚礼，给许多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主持三校合并，可谓有勇有谋。他也像中国人一样，看重人情世故。“让燕京在中国站住脚，最牢靠的办法是发展个人之间的关系。”事情往往都是成也萧何败萧何。个人间的关系往往很难维持，尤其是中国人。最终这也毁了燕京。“在过去任职于教会大学的中国校长中，大多数人都有把教会大学变成中国人自己学校的梦想，吴雷川如是，陆志韦亦如是。”其实相对于扉页的那句话来讲，这句才是书中最有含金量的一句。在燕京大学的人，很难统计有多少人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也很难知晓有多少人在“根据自己的意图在修缮那块地皮上的房舍”。没有一颗创办学校的胆，却有一颗将学校据为己有的心。而理由却很是堂皇。“在中国政府注册之后的燕大，不再完全是外国式的、根在外国的西方教会的一部分，而是开始成为中国教育系统的一部分。此时的燕大，从差会暂时的使命，变为中国本土上永久的事业。”即便燕大如此，却也难以让这些心满足。春秋之后，罢黜百家，学出一孔。陆志韦的梦想也只是看起来在实现罢了。傅泾波万分感慨：“如果当日老人家（司徒雷登）去了北平，恐怕以后很多历史都要改写了，甚至朝鲜战争都有可能避免！”我感觉书中最呼应他这句话的是“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张东荪却带着失望从西柏坡回到了北平。”

17、1949年，领袖之雄文《别了，司徒雷登》让这个中西合璧的名字家喻户晓。几十年过去了，很多人应该都还认得这个名字，并且仍然将其当作帝国主义“纸老虎”的可笑象征。这位创办了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这位在中国出生、在华活动了长达50年的美国人，临终时希望能安葬于北京燕园。然而，燕大早在1952年已被撤销，原校址归北大所有，因为被“毛主席批评过”，此事也迟迟得不到北大批准，最终只好入土杭州。一位为中国教育做出杰出贡献的异邦人，竟连埋葬到他曾奋斗过的地方的权利都没有，为何会遭如此对待？同时，其创办的燕京大学，作为一座在近代中国地位显赫的教会大学为何在几十年里近乎湮没无闻？恐怕归咎于他们不幸地趟进了那滩政治的浑水。不过，尽管历史有其模糊、吊诡之处，但总归会在时间的淘洗中褪得清清楚楚。近代史学者陈远在其新著《燕京大学1919—1952》中，通过现有的文献及其长年走访的资料，较为完整地还原了燕京大学从1919年建立到1952年撤销的历史。陈远并非燕大人，但他多年对该题材的关注足以使他称得上“名誉”的燕大人，燕大有其传继薪火，亦是幸事。尽管书中文字偶尔带有作者先入为主的情绪判断，但基本上保持了对历史回溯的克制。该书也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校史，作者尤为注重刻画以司徒雷登为代表的燕大人，他们的作为、风采和精神得到了生动的展现。司徒雷登当然是全书的核心人物，作者在前言中直言“前人对于司徒雷登的研究对这本小书的写作惠泽良多”。这位曾经在领袖笔下坐收渔利而落寞归国的政客，在陈远的笔下则是一位坚持先进教育理念的成功校长。首先，他力主融合中西，并认为要将燕大建设为一所长期存在的世界一流大学，一定要跳出教会大学的局限进行“中国化”。为此，他大量聘用中国教职员，延揽名师，向中国政府登记备案，向中国社会各阶层筹集校款，并且同情、包容和支持中国的民族运动。因此，当教会大学中曾经的翘楚、“东方的哈佛”圣约翰大学日渐衰落之时，燕京大学却如日中天，短短时间内即与清华、北大齐名。其次，司徒雷登将燕大作为一个大家庭来营造。开学时，他要与每位新生握手，还会在举行茶话会；学校教职员的婚嫁，圣诞节宴会，学生毕业告别，无不是由他主持。因为他将全身心都投入到了燕大，对全校师生如大家长般的关怀友爱，使得司徒雷登深受校友爱戴，正如陶覆中所说：“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和燕京大学可以说二而一、一而二，分不开的。”最后，尽管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来华传教士，但他并不坚持向个体人传教布道的旧式套路，而是试图让基督的精神力量去充实整个社会。因此，尽管燕大实行宗教与教学相分离，将神学被改为选修课，但根源于《圣经》的燕大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却深深地影响了所有燕大学子。不过，这种基督精神下积极入世的情怀并非总是带来好事。当司徒雷登授命积极调停国共之争和改善中美关系之时，绝未想到他会成为领袖挖苦讽刺的对象；他担任大使很重要的原因是出于谋求燕大的继续存在，但没想到这次政治使命不仅导致他永别中国，而且促使燕大历史迅速沉沦。将中国近代史的一切简单地解释为反帝反封建两条路线下中国人民的斗争史是中共史论的基本逻辑，教会大学的全盘覆灭可视为反帝逻辑的必然。1952年，全国的院系调整，这座曾经以新闻系、社会学系和历

史系等专业闻名世界的综合性大学永远地消失了。“没有学术自由，就不会有顶尖的大学”，这是当代中国的症结。而燕大的历史则不仅仅是学术自由的问题，而涉及到整个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问题，一如作者在扉页所写：“大学的历史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对待大学的态度反映一个国家对待文明的态度。”1949年与司徒雷登一起道别的固然有美帝，但更有这个民族对待生命、知识和真理的人文精神。数十年后，在理想时时崩塌的今天，归兮，司徒雷登！

18、史上已无燕京大学。燕大诞生于伟大的五四时代，1952年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被撤消，退出了历史舞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所曾经相当辉煌的大学已经整整消逝了六十多年了。但燕大的精神尚在，由她的昔日的学子传承，她的美丽的校舍现在仍然是北大校园的最美丽的风景之一。燕京大学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她是由华北地区的几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的，包括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大学、华北女子协和大学。这几所教会大学是由不同的教会合办的，因此开始时的管理非常混乱，一直也找不到合适的校长，直到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长，学校的发展才走上了比较正规的发展。可以这么说，燕京大学在司徒雷登手中诞生，在司徒雷登手中成熟！司徒雷登何许人也？很多人可能都是从毛泽东的名文《别了，司徒雷登》中首先知道这个名字的，当时他是美国驻华大使。正因为这篇文章，“司徒雷登”在中国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但实际上，历史上的真实的司徒雷登其实对中国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他参与创立的燕京大学就曾经在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在今天的杭州下城区耶稣堂弄，能说一口杭州话。后去美国上学，1904年结婚后回杭州后开始传教，并开始研究汉语。1919年司徒雷登刚接手的燕京大学，规模很小的，学生也只有九十多人，师资力量也是相当薄弱，经费也是少的可怜。司徒雷登没有气馁，而是迎难而上。从1922年起，十多年间十次往返美国积极进行募捐筹款，其中一次竟然募得150万美元。经费有了保障后，他决定为燕京大学另选新址。通过种种努力，最终在清华园西边找到了一个适合的新地址，面积到40公顷，后又陆续购置附近的园地，使得燕大的面积达到原来的很多倍。这为美丽的燕大校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燕京大学校园的建设，耗费了司徒雷登的大量心力，这个融合了中西文化的当时世界上美丽的校园是他的得意之作，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晚年在美国，他一直惦念燕园，临终前立下遗嘱，希望能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他妻子的墓地旁。可惜2008年的时候，司徒雷登骨灰葬于美丽的西湖旁，没有和他的爱妻合葬在美丽的燕园，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燕京大学初创之际，司徒雷登就非常注意聘请名师。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燕园里就云集了一大批的名师，诸如容庚、郭绍虞、周作人、郑振铎、陈垣、顾颉刚等学界名流都在燕园任教，燕园里可谓一时风云际会，风光无限。名师出高徒，燕大的学子孜孜以求，为后来的学术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像雷洁琼、费孝通、侯仁之、王钟翰等人，后来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更是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1926年他的爱妻死后，他更是把自己的一腔热血全部扑在燕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上。他把燕园当作大家园，把学生当作家人，他能够准备地说出很多学生的名字。每年的6月24日，燕大的学生都会来到他居住的临湖轩为他祝贺生日。届时，临湖轩里暖意融融，充满了快乐的笑声，师生情谊莫过于此。如此融洽的师生关系让人羡慕！斯人已逝，遗物遗迹尚存。他和燕大的故事在不断地流传。漫步美丽的燕园，睹物思人，让人追怀。追怀那个人，那个大学，那个时代。

19、最近有两则关于大学的新闻吸引了我的注意。一则说，2013年全国高考录取结束，香港大学从北大、清华手中抢到16名省市状元。另一则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卸任，研究院的国际评审、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说：“（过去几年中国高校中兴起的各种研究院、研究中心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在这里面的确是名列前茅，这是一个特别的例子。”两则新闻里的两个关键词——“抢”和“特别”有点意思。自从2003年教育部开放港澳高校自主招生，最为各大高校看好的高考状元们开始大幅“外流”，其中主要流向香港大学。这样的流向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英国《泰晤士报》2012—2013年世界大学排名中，香港大学以第35名超过北大（46名）和清华（52名）。而在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世界大学五百强排名中，北大、清华和港大同列在第151—200名的区间内，低于名列101—150名的台湾大学。两份榜单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喊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们仍然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甚至在和港台地区的比较中都落了下风。王德威教授说复旦文史研究院是一个“特别”的例子，应该是说它难得地在国内大学形形色色的研究中心里做出了一点特别的成绩——主要是《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和《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的整理出版。而意味深长的是，葛兆光将能取得这点成绩归功于复旦大学：“（学校）不管事非常重要，因为不限制你做任何事情。”由这两则新闻，我联想到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这所1919年建校、1952年消亡的大学，在短短的三十余年间成为世界一流大学。1928年，“美

国加州大学对亚洲高等院校的学术水平进行调查，燕大被列为全亚洲最好的两所基督教大学之一，并认定燕大的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美国的研究生院攻读学位”。这是今天连北大、清华毕业生也享受不到的待遇。也正是在1928年，后来鼎鼎大名的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在物资和人手奇缺、战火不断的年代里，先后完成出版64种、81本中国古籍“引得”，至今还是世界汉学研究者的的重要工具书。

历史的对比让人唏嘘。今天教育界苦苦追求而不得的“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先进科研成果”，我们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就已经实现。专于知识分子研究的谢泳认为：“中国在20世纪初和西方接触时，有三件事的转型是完成得非常成功的……一件是现代大学制度……”燕京大学的迅速崛起和学术成就，正是因为它一开始就建立在领导人（以校长司徒雷登为首）的先进治校理念和现代大学制度设计上。这些理念包括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等，这也正是从13世纪初的巴黎大学肇始以来，西方大学赖以发展的一贯的精神内核。当时，燕京大学虽是一所教会大学，但“燕大的基督化氛围更多靠的是司徒雷登和教师们与学生之间的个人交往和人际关系，以及由此营造出来的环境熏染和精神影响”。正是独立于教会和政府（国家）的自由，使燕大的学术花粉如沐春风，在抗日战争前的短暂安定中迅速繁荣，蔚为大观。

当年燕大的学术氛围，当然还离不开校长（后改任校务长）司徒雷登的苦心经营与一批名师的合力鼓呼。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周作人、钱穆、冯友兰、郑振铎、朱自清、洪业、赵紫宸、吴文藻、冰心，等等，这些中国近现代史上声名赫赫的学者、作家，都曾在燕大授课，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培养了一批传承学术火种的人才。他们的成就，仍然让后辈学人高山仰止。

读《燕京大学1919—1952》，印象最深的是司徒雷登在1939年圣诞节前写给燕大教职员的孩子们的一封信：“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年的耶稣圣诞节眼看就快要到了，我为了要欢迎你们在圣诞节那天到我家来聚会，特意托我的几位朋友来帮助我筹备这个盛会。希望你们和爸爸妈妈商量，请他们准许你们那天能够到会参加。你们如果决定前来，请把你们的名字填在下面所附的回条上，于12月10日前送交校长办公室处转给我。以后我要根据你们的回条预备茶点，发请帖正式来请你们，并告诉你们开会的时间。敬祝你们活泼快乐。——你们的朋友司徒雷登”难怪冰心在《司徒雷登校务长的爱与同情》一文中亲昵地称呼他为“我们的司徒校务长”。今天连毕业典礼致辞都要秘书代劳的大学校长们，大概是不屑给小朋友们写这样一封邀请函的。这正是行政化了的高校校长们的权力傲慢，因这样的傲慢，他们不自觉地丧失了自己的爱与同情。

1952年，在对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权力傲慢中，燕京大学消亡在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在这场以调整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加速专业人才培养为表面理由的运动中，燕京大学被瓦解，各部分相继并入北大、清华、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一所享誉中外的著名大学从历史中消逝了。而作为“消亡”一幕的缩影，中国社会学家的摇篮——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也遭致了分崩离析的命运。中国大学的社会学和法学此后一度被取消，直至1978年才恢复。布尔迪厄对此有一针见血的评论：“社会科学即便仅仅描述事实与效果，即使仅仅揭示某些机制，它产生的效果也具有批判性。因此社会学的存在本身便是无法容忍的，任何专制政体从一开始便取缔社会学。他们要求的是实用社会学，这种社会学有助于调节矛盾和冲突，有助于使统治合理化。”（转引自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司徒雷登，这位将自己的一生与燕京大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校长1962年在美国华盛顿去世。他在遗嘱里希望将自己的骨灰安葬于燕京大学。但直到2008年，他的骨灰才在多方努力下，从美国运回，安葬于中国杭州。这让我想起了野夫在《尘世·挽歌》中讲的一段故事：他在武汉大学作家班的一帮旧友发起，想为武大老校长刘道玉塑一尊铜像，立在珞珈山下，竟被武大校方拒绝。野夫感叹道：“相信先生之伟岸，早已塑像于万千学子之心，而后世之武大，终将被先生之光芒所烛照也。”如今，在杭州半山安贤园内，司徒雷登简朴的墓碑上仅仅刻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简单的几个字。虽未如愿安息于燕京大学故地——今天的北京大学校园内，但相信天道人心，自有公论。陈远的这本燕京大学校史，也可拂去历史的尘埃，烛照后来人。

20、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博雅塔、未名湖原本不是北大的标志，而是燕京大学的遗产。燕大的弦歌雅诵、风流际遇慢慢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大概得归功于钱穆、洪业、顾颉刚、周一良、侯仁之等先生的回忆。顾颉刚曾充满感情地说，在燕京大学那几年是他一生中最惬意、最充实的段落。洪业的终身成就跟燕大密不可分，除了史学研究上的贡献，其荦荦大者，就是执掌燕大历史系，主持哈佛燕京学社，创立引得编纂处，作育英才，桃李满天下。周一良、侯仁之都是洪业的得意门生，晚年缅想燕大岁月，情深意浓。钱穆在燕大任教时间虽不长，但那是他首次在高校执教，与以往在小学、中学的经验相比，“感觉迥异”。未曾受过大学教育的洗礼，深受传统文化的濡染，钱穆的这种感受，跟燕京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颇有关系。这座华北知名学府，由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大学、华

北协和神学院和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合并而成。初期校址在北京东城盔甲厂，1926年迁至海淀，东为成府村，西为挂甲屯，也就是现今北大的所在地。燕京大学存世仅三十八年，却在“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燕大精神的熏陶和磨砺下，英才辈出，硕果累累，成为“教会大学之首”，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可是，这样一所高校，终究没能逃脱名为院系调整、实则肢解沦灭的命运。更可叹的是，学界对燕大的关注和研究还远远不够，尤其是与她曾经的光辉与荣耀不相匹配。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近出版的《燕京大学：1919—1952》自有其特殊的价值。定位陈远兄的《燕京大学：1919—1952》，用他自己的话说，并不是一本“严格的校史”。而这个定位，对本书的写作至为关键。读者品评该书，也应予以充分的注意。这书从燕京大学的诞生写到她的消亡，但并不面面俱到，相反重点突出，主要是从“中西方文明冲突的角度入手”，讲述燕大在一系列紧张冲突中不断调试，成为一流学府继而又被撤销的历程。因此，本书重“变”不重“静”，重“冲突”不重“平和”，也就缺乏一般校史所津津乐道的趣闻轶事，也不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和校园生活的描摹。我们固然可以说这是缺点，但联系本书的定位，也完全可以说是它的特色。或许可以这样打比方：砍掉了双臂，维纳斯才显得更加迷人。除了第五、六章“学术上的崛起”稍微介绍燕大的院系之外，全书基本上是围绕着一个个“问题”展开的。即使上述两章，也不是静态的铺陈成绩，论功摆谱，仍然是围绕中西文明冲突来讲述的。作者明确表示，“本章之所以选择国文系、历史系和社会学系等详加叙述，是因为国文系的开设改变了过去燕京大学作为教会学校以西语教授的状况，而新闻系和社会学系的开设在当时的中国可谓是领一时之先。”值得指出的是，本书的这个定位和选择，是有其主客观方面的原因的。作者在“自序”中交代，尽管燕大以档案保存完备而著称，但要查看这些档案却是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放弃了主要依靠档案的想法，转而采用以当事人口述为主、档案为辅的方式。缺憾一方面，以中西冲突来梳理燕大的历史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另一方面，“燕京大学：1919—1952”这个标题对于这样的梳理和研究，无疑是一顶过于硕大的帽子。所以，本书材料相当丰富，行文也很流畅，读来却不甚过瘾，时常有刚刚入题而又匆匆煞尾的感觉。比如说，成都燕大历时四年，在燕大校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本书只用极短的篇幅就打发了，远不如岱峻先生《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来得饱满丰富。还有，余英时先生说：“曲终奏雅，作者写全书最后（同时也是最长）的一章，笔下充满着感情，对于这一中西文化结晶的逝去，不胜其惋惜和伤悼。我读这一章也感动最深，因为我恰好短暂地参与了‘燕京消亡’的一幕！”然而，因为本书采取的角度以及档案材料上的缺陷，对燕京人物、校园氛围及相关议题未能充分铺展渲染，到了最后一章，纯粹就阅读感受而言，读者对燕京的消亡恐怕不会像余先生这个当事人那样“不胜其惋惜和伤悼”。当然，这可以说是苛求了。但这并非作者不能为，而实在是囿于客观环境。从这个层面来说，该书无疑完成了它的使命，从燕大一隅折射出现代中国的坎坷命途。

章节试读

1、《燕京大学1919-1952》的笔记-第236页

首先，这不是绝句吧 难道还有八句的绝句么
凤凰山 其一

王安石

欢乐欲与少年期，人生百年常苦迟。

白头富贵何所用，气力但为忧勤衰。

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

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

其次，

文中用后俩联 但“贞观开元”作“开元天宝”，“走犬”做“走狗”不知道这是作者误还是吴兴华误

2、《燕京大学1919-1952》的笔记-曾经的大学

在过去的大学里，有过丰富的校园生活，有过教授治校的漫长岁月；演讲是自由的，讲课是自由的；没有统一教材，不必讲自己不愿讲的东西；学生可以批评教授，教授也不怕得罪学生；教授是自由流动的，不用看校长的脸色，合则留，不合则去；职称是真正的学衔，由校长说了算，真有水平，没有学历也可以，在这所大学是教授，在另一所大学可能你连一个助教也当不上，没有终身制，没有铁饭碗。那时的教授和学生也不满意他们的生活，他们依然在为更高的理想而奋斗。这一切后来都消失了，好象没有发生过一样……

——谢泳

当现实困惑越来越多时，人们往往会从历史中寻找智慧。近年来，随着晚清史和民国史的升温，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从蔡元培到胡适》和《陈寅恪与傅斯年》之后，岳南耗时8年写作的170万字巨著《南渡北归》再次掀起狂潮。往事并不如烟，从这些回首百年的历史沧桑中，当下的人们更容易看清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坎坷之路。

作为一本典型的民间历史文本，陈远《燕京大学1919—1952》是对尘封已久的燕京大学的一次成功打捞；虽然很多历史档案仍被封禁，但来自亲历者的口述史却增添了另一种真实与鲜活。

作为知识分子的发源地，大学在西方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如果再向上追溯，那么古希腊才是西方大学的真正源头，从苏格拉底的思辨到亚里斯多德的推理，柏拉图的乌托邦理想就是以他的学院来支配城邦政治。一般人们将建于1088年的意大利波隆那大学视为世界最早的大学。在中世纪，大学如雨后春笋一般，先后传播到法国、英国，之后再回到德国和俄罗斯，后来又到了美国。早期的大学多是自治团体，它既不隶属于教会，又不受制于政府，有相对的独立性，其目的就是为了自由的研究学术。博洛尼亚大学甚至有独立的审判权。

大学是一种理想的传统，因为大学，知识分子成为一种职业。无论是私立、国立还是教会大学，他们一般都保持着独立管理和学术自由，即使在接受外来资助的情况下。巴黎大学由原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学校发展而来，教授由教会发给薪俸；学校的管理人员由取得博士和硕士学位的人选举产生。英国的大学没有一个是国立的，他们都是私人组织的团体；它们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获得大量补助，但是政府发给补助并不附带严厉的条件，也不以约束为交换。可以说，正因为有了这种自治的传统，思想才前所未有地成为一种社会力量，从而引发了一场接一场的思想革命。换句话说，没有这些大学，就不可有有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基督教与现代大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一个清教徒创立的国家，美国的大学大多为教会所建，著名的如哈佛、耶鲁和康奈尔等大学，这些大学的历史甚至远远超过美国的历史。中国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但却缺乏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所谓的稷下学宫、太学、国子监等等书院以儒学教育为主，其唯一目的就是培养依附于皇权的统治官僚。

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也称通识教育）是美英大学的最大特点，比较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强调自由、独立发展；这种体制下的大学并不是为了造就技术专家，只是为社会培养受到较全面基本训练的优秀公民，大学就是启蒙，赋予他们完整的自学能力和独立精神，专业能力在大学毕业以后才开始培养。牛津运动的创始人纽曼甚至说认为“大学应该是培养‘英国绅士’的地方”。磨刀不误砍柴工，仅仅一代人的时间，这种具有思想精英和贵族精神导向的大学传统在中国很快结出了丰硕成果，至今亦令人无限怀念。

从某种程度上，燕京大学是中国大学历史命运的一个缩影，甚至更为典型和悲壮。作为一个由美国人创建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体现了大学这种精英教育方式的西方性和世界性，这也使中国大学从一开始就与世界保持同步。比如1928年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就是这种同步与合作的最好体现。

1919年，汇文大学与协和大学合并成立了燕京大学。燕京大学的建设经费大多来自美国的个人捐赠。燕大虽是外国人所建，但几乎所有的院系主管都由中国人来担任，大多数教师也都是中国人。在崇尚自由民主的燕大，中外不同国籍的教职员待遇均等，教授月薪360元，校长亦如此，这几乎是一般工人月薪的20倍。到30年代，燕大共建成1个研究院，3个研究所，4个学院和19个科系，一时之间群贤毕至，如洪业、冯友兰、吴文藻、雷洁琼、周作人、陈垣、顾颉刚、钱穆、钱玄同、朱自清、谢冰心、许地山、齐思和等。

燕京大学治学严谨，根据当时制定的教职员资格标准，1922年只有4人被认定为教授。作为中国最好的文科院校之一，燕京大学的新闻、法学和社会学等科系人才辈出，费孝通、瞿同祖、吴文藻等一代社会学大家俱出自燕京。在二三十年代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中，燕大社会学系成为最活跃的一支力量。

事实上，燕京大学并不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北洋大学、上海交大和北京大学比它要早20多年，而且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

1898年，作为那场短命的百日维新的硕果仅存，京师大学堂打开了中国大学的大门。一群传统时代的改革者试图以这种带有近代西方教育特征的新式学堂，来取代科举时代的书院。担任总监督的孙家鼐虽是旧派学者，但他非常开明，经他推荐，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西学总教司。教学计划包括英语、法语、俄语、德语和日语，还有天文学和数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这与传统的儒学教育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在科举体制下，这种新式学堂的学生仍来自传统的秀才和举人，他们等待将来在科举考试中得到功名

，然后去做官。因此这些所谓的“大学生”，完全是一副候补官员的作派；比起“无用的”西学来，他们更喜欢吃喝嫖赌。1905年，延续千年的科举被废除，彻底斩断了大学与官场之间的脐带。

1912年清朝逊位，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作为中国近代西学的开创者，大思想家严复被袁世凯总统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严复对西方近代文明有着深刻体验和理解，他用了仅仅半年时间，就把这一前清遗物改造成一个真正的近代教育机构。在严复的力主下，外语和近代科学方面的能力被视为合格大学毕业生的标志。他不仅聘请了更多的外籍教师，还鼓励师生用英语上课。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对严复来说，他最大的贡献或许是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名正言顺的表示这是一所近代大学，而不是传统的进仕之路。遗憾的是，作为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严复在一片围攻中黯然离开北大。

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大学其实是从一批传统士子手中发展起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兽镛等，这些开路者全部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但他们却都非常开明，对世界潮流和现代教育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使中国大学在短的时间内就与世界接轨。可以说，正是蔡元培成就了日后的北大。“除了蔡元培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够通过办一所大学来引导一个国家和时代的变迁。”（杜威）

1916年，蔡元培结束了长达7年的留学生涯从德国归来，将北大带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蔡元培甫一上任，就立下宏愿，要让20年后的北大达到柏林大学的水准。与严复一代相比，蔡元培是彻底跳出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思想束缚；在后来的历史中，蔡元培几乎成为中国大学和学术自由的象征。“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他不仅网罗了陈独秀和胡适这样的新文化领袖，也请来了辜鸿铭和梁漱溟这样的奇人，而梁只有中学学历。蔡元培认为，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以“兼容并包”的宽容精神，“学术自由，学校自治”，积极维护学术的尊严和知识的自由，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不仅是空前的，也可以说是绝后的。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不仅得到蔡元培的庇护，还得到了他的资助，这份非学术性的私人杂志影响巨大，为一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从北大迅猛地扩展到校外。最终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蔡元培为此不得不引咎辞职。

因为五四运动，北大不仅仅只是一所大学，它改变了一个社会和国家。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学生不仅是旧传统的破坏者，更是现代思想的启蒙者，他们通过对社会和积极的介入，将新思想和新希望带给更广泛的中国民众。

从历史来看，“五四运动”是非常幸运的，这些爱国青年之所以敢于走上街头，是因为他们确信其精英的社会地位能使他们免于暴力袭击，事实也是如此，1919年5月4日的天安门游行中没有一个人被杀，警察受命保持和平中立并维持秩序。但之后，他们失去了暴力豁免权。1926年3月18日，举行抗议游行的大学生受到段祺瑞卫队的袭击，鲁迅为此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在以后的岁月里，有更多的学生和学者被杀害。1927年以后，大学生的抗议被视为非法活动，五四精神就这样被暴力和恐怖窒息了。

除过五四运动，还有一件改变历史的事件也与北大有关。1918年，蔡元培在北大成立进德会，对知识分子提出“八不”：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吃肉。当时担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依旧是八大胡同的常客，这让蔡元培极其尴尬。迫于压力，蔡元培于1919年3月26日夜开会，决定取消学长制，同时还给陈放了一年长假，这等于将陈独秀暂时革职放逐。胡适后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

此后月余，五四运动爆发，不再担任教职的陈独秀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甚至亲自站在大街上发传单。

直到6月11日，在城南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陈独秀被当局逮捕。虽然3个月后陈独秀被保释出狱，但北大已经回不去了，他只好南下上海。

在法租界，陈独秀邂逅共产国际的代表，双方一拍即合。经过一年多的筹划，改变中国现代史的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在陈独秀和李大钊手中诞生了。作为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将张申府和毛泽东发展为第一批党员，张和毛都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张申府又发展了北大学生领袖张国焘（张也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毫无疑问，这群北大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始作俑者。

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

1919年5月4日，下午1时30分，来自13个大学的3000多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最后到达的是北大学生，《北京全体学生宣言》成为这次运动最著名的纲领性文本，他的起草者是北大三年级学生罗家伦。五四运动之后，罗家伦出国留学，在美国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历史和哲学。9年之后，31岁罗家伦回国，成为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

1909年，美国基于文明和良心，决定将庚子赔款分39年退还给中国，但定向于现代化教育，要求中国每年选派100名学生到美国大学学习；为此专门成立了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以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的成立为标志；仅用了10年时间，清华已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学。

“大学里知识的发源地，就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在某种程度上，罗家伦继承了蔡元培的自由精神，他为清华大学奠定了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在1930年代，清华大学远比北大要自由得多。五四一代在清华大学延续了另一种传奇，特别是学术批判精神。用陈寅恪的话说，清华精神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与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没有清华大学，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以清华大学为平台，美国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知识精英。这些来自传统私塾的留学生背井离乡，在大洋彼岸发奋苦读，完成学业后再回国服务，很少有滞留不归者。胡适是第二期的庚款留美生；当时胡适贫困潦倒，若不是官费留美，他或许一生只能在赌场里跑堂。胡适于1910年去美，1917年回国发起新文化运动。一般留学时间为10年，1920年以后，清华留美学生陆续进入归国高潮期。这些掌握各种世界前沿科技和思想的学者专家，对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于1922年从清华留美，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和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后，于1932年回清华任教，此后辗转西南联大，又将更多的人领上学问之路。何炳棣就是他的学生之一，在西南联大毕业后留美。

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于日军之手。国民政府并没有因为战争而放弃教育，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一起南迁至昆明，联合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8年抗战，这所战时大学不仅是中国最好的大学，而且达到了中国大学的巅峰。作为西南联大的主力阵营，清华大学赋予其强烈的西方色彩，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这些现代大学精神在西南联大变成现实。“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联大纪念碑碑文》）。

这个群星灿烂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既具有坚实的传统教育根基，又不乏现代学术能力，这种中西贯通、博大精深的学术功底可谓空前绝后。早在清华大学设国学研究院（1925年）之时，就要求被聘任的导师“通晓中国文化之全体”，并对外国文化有相当的了解。当时的名师多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像王国维、朱光潜、冯至等人，既讲授西方哲学、美学，也讲中国古典文学。

更为可贵的是，西南联大这座民主堡垒孕育了整整一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由和民主不仅是一

种追求，更是一种传统。虽然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言论自由。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在演讲时说：“现在中国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

1941年，哲学教授贺麟在《学术与政治》一文中写道：“我们必须先要承认，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一个学者争取学术自由独立的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

对一所大学来说，它最大的价值在于教授。西南联大无疑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专业精进，而且品德高洁，既有传统的“士”气，又有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他们并没有局限于学术的象牙之塔，而是充满家国情怀。储安平《观察》周刊之所以影响巨大，正因为拥有一群为其撰稿的大学教授。这些知识精英以其真见卓识和大仁大义，顽强地支撑起一个民族的思想与精神。

对知识分子来说，人格独立是其存在的前提，正如学术自由是大学存在的基础。虽然时局动荡、武夫当道，但在一种尽管有些残缺的民主政体下，当时的大学竟然不可思议地成为一个世外桃源般的理想国。这些身处其中的知识分子不仅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而且可以自由流动。有钱，有自由，人也就特别有志气，有尊严感。当时教育部要求，西南联大担任大学行政职务的所有教授必须加入国民党，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坚决拒绝。教育部又决定给每位担任行政工作的教授发一笔“特别办公费”，再次被拒绝，他们认为这对没有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是不公平的。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西南联大也有训导处，但对学生的管理，主要还是通过学生自治会、学生社团和学生的各种自主活动进行的。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教育象征着未来。“无用之用，知之者稀，若吾辈不图，国家将来必蒙其祸”（胡适）。对捉襟见肘的民国政府来说，教育支出是仅次于军费的第二大财政开支，超过政府行政费用。蒋介石说：“这一战，一是为争取民族生存，二是要改造我们民族，复兴我们国家，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看到战后。”如今回首那段峥嵘岁月，即使在最危急和最艰苦的年代，人们也没有失去对未来的希望和信心，将教育丝毫没有放松，甚至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人文学科也得到同样的重视。竺可桢在1941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大学培养的是领袖型人才，要使大学生能担当得起日后建国的重任，单教他们具有专门技术是不够的。”

司徒雷登的悲剧

从启蒙运动到工业革命，洪堡创建的柏林大学将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等，这被认为是现代大学的开端。出自柏林大学的蔡元培后来将这种理念带到北大，使中国大学迅速步入世界主流。进入20世纪之后，美国崛起，大学开始从教育机构和研究中心转向服务社会，现代大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如果说没有蔡元培就没有北京大学，那么没有司徒雷登也就没有燕京大学。相对于蔡元培的北大，司徒雷登的燕大正体现了这种服务社会的新理念。“我们的目的，是以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

从一开始，燕大就来自于社会，它完全是司徒雷登和他的同事用自己的诚意募捐建立起来的。他们前后10多次赴美，共募集资金2000万美元。“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司徒雷登的这句话不免让人想起中国的武训。

司徒雷登刚接到校长聘任书时，燕京大学只有20几个教授和不到94个学生，甚至连校舍都没有。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从选址、设计、建设、筹资、组织到管理，司徒雷登奔波于中国和美国之间，共募集

资金2000万美元。1929年，一座美丽绝伦的现代大学就这样筚路蓝缕的诞生了。它既有亭台楼阁的中式风格，又不乏最现代的管理水准，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无论硬件还是软件，燕京大学都达到一流水平。

司徒雷登常常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他其实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世界公民，他坚持的理念是普世的人性。他当燕京大学校长时，能记住燕园里每一个教职员，包括一名普通的园丁。

司徒雷登提倡学术自由和思想包容，超越宗教信仰和政治倾向，不惜重金延请名师，彻底摆脱了传统教会大学的局限，“我的任务是让老师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在燕大，无论是中国老师还是外国老师，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能互相尊重，平等共处，“燕大一家”体现是一种世界精神。司徒雷登要求燕大的学生既中国化，又国际化，对政治既能宽容对待，又能直面现实。即使在白色恐怖最严厉的时期，马克思和共产主义仍是燕大师生一种重要的课题。从五四运动直到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北平的街头总少不了燕大学生的身影。

在“3.18惨案”中，燕大的魏士毅被杀害，司徒雷登亲自主持了追悼会，为在燕大校园为她立碑纪念。“9.18事变”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师生走上街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34年，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燕大学生一边宣布罢课，一边组织请愿团奔赴南京。闻听此事，正在美国的司徒雷登急急赶回，有人以为他会劝阻学生，不料他说：“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大的学生是否也去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答复‘是’，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七七事变后，北平的大学都被日军占领，燕京大学成为一座自由的孤岛，华北地下抗日活动在这里得到秘密的保护，为抗日后方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和急需物资。日本宪兵每次欲进校搜查，都被司徒雷登挡在门外，一些燕大学生在校外被捕，也总是被从日本人那里救出来。

从1934年4月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燕京大学做了两年新闻系教授，他在这里结识了史沫特莱和中共地下党。1936年6月，斯诺向司徒雷登告别，前往陕北采访。《燕大周刊》率先连续发表了来自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这是国内中文报刊对中共的第一次公开报道。作为第一个采访中共的西方记者，在以后的岁月里，斯诺一直是中共的座上客。

1941年日美开战，燕大终究被封，司徒雷登也身陷囹圄。在长达三年多的牢狱中，司徒雷登把自己在华的大半生写作整理成文字，这就是后来的《在华五十年》。1945年二战结束，司徒雷登重获自由了，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却以失败而告终。1946年，在马歇尔的推举下，司徒雷登成为美国驻华大使。当时胡适刚刚卸任中国驻美大使，回到北大做校长，司徒雷登却走上了一条相反的道路。

司徒雷登是一个虔诚而宽容的基督徒，也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家，但他却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我之参与若存一线希望，促使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政府及统一的军队以结束此场耗竭民力、自相残杀之内战，我即不惜代价，全力以赴。”可惜他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内战全面爆发。司徒雷登为此深感自责：“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未能说服任何一方为达成协议而作出让步。”

1949年4月，解放军占领南京，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大使都跟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只有司徒雷登还留在这里，直到8月2日被迫离开。这次离别不仅是离开了南京，而是永远的离开了中国。6天之后，中共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作为美国大使的司徒雷登被讽刺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这后来的日子里，这篇文章被列入教科书，成为每个中国人必读的名篇，“司徒雷登”这个名字以这种不幸的方式在中国流传……

回到美国后仅3个月，司徒雷登就一病不起，3年后辞去大使职务，又在病榻上度过了最后10年，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病故。中国古语说落叶归根，对司徒雷登来说，中国才是他魂牵梦绕的故乡，那里

埋葬着他的亲人。司徒雷登临终留下遗言，希望自己的骨灰能安葬燕园。虽然作为“燕大之父”的司徒雷登没能实现这个遗愿，但作为燕大教授的斯诺却得到了如此“殊荣”。1972年，斯诺去世，他的一部分骨灰运抵中国，安葬于燕园。

1954年，《在华五十年》在美国和台湾出版，1982年，北京出版社首次出版了这本回忆录。作为一个深深介入到中国历史的社会活动家，司徒雷登对中国既充满热爱和同情，又有深邃的洞察和远见：

我看到一场伟大的斗争正在进行着，所争执的问题对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和全人类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是让无神论的、无情而专制的共产主义制服并统治世界呢，还是让政治、经济、社会的民主原则和实践……成为一切人的生活方式呢？共产党人已经宣布了崇高的社会目标，然而他们所遵循的却是“只要目的正当，任何手段都可使用”这个不道德的原则。他们已把欺骗发展成一种高超的艺术；他们依赖武力、诈骗和虚伪。在他们看来，倘若把人类投入苦难与毁灭符合他们的目的的话，他们将毫不犹豫地这样做。……我不相信任何一个一味追求唯物主义和对一切批评与反对意见实行暴力镇压的政权或制度能够长存。

对司徒雷登来说，5年大使的失败，遮蔽了长达27年的燕大荣光，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悲剧。在中国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不仅司徒雷登成为禁忌，连燕京大学也被悄无声息地从历史中抹去。直到半个世纪后的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到北大，“这个校园过去是美国传教士创建的燕京大学的所在地，……1919年6月，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司徒雷登准备在此地发表第一次毕业典礼演说。在指定时刻，他出席了，但是却没有学生露面——为了振兴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学生全都上街参加‘五四运动’去了……”

燕京大学和司徒雷登就这样再次回到中国。2008年，司徒雷登的骨灰被安葬于杭州，这里也是他的出身地。墓碑上用中英文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大学的终结

虽然北大清华等名校大大推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但掌控现代中国的命运却是两所不起眼的“大学”，它们是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和共产党的延安抗大。在一个后帝国时代，决定中国命运的是一群军人而不是知识分子。

1946年，国民党、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其他民主党派就战后中国的政治前途，在重庆举行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最后达成《和平建国纲领》。但不幸的是，政治很快就被战争取代。3年之后，作为战争的胜利者，共产党单独召集民主党派举行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根据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共与其他民主党派建立了一个新的联合政府。在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中，中共是少数派，超过半数的委员由民主人士担任，这些民主人士以来自大学的知识分子为主。经张奚若提议，新国名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大教务长曾昭抡被任命为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在首届政协选举国家主席时，576名委员中，只有燕大的张东荪投了毛的反对票。

1948年12月，正逢北大50年校庆，在校庆前三天，胡适不得不离开北平南下。在南京举行的纪念会上，胡适潸然泪下：“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1949年，即民国三十八年，中国和中国人的命运在这一年发生改变。龙应台在《大江大海1949》中记录了一代人的困惑：走，还是不走？许多知识分子的悲剧就在那一刻注定了，“一滴水怎么会知道洪流的方向呢？”

胡适走了，傅斯年走了，罗家伦走了；冯友兰没走，钱钟书没走，马寅初没走；季羨林从香港回来了，陈寅恪从英国回来了，老舍从美国回来了……早年毕业于燕京，后又回燕京任教的“老燕京”侯国聘先生，像当年的王国维一样选择了投湖自杀；而燕大校长陆志韦却迫不及待的请求新政府接管燕大。

汉娜·阿伦特认为，大学教育的知识只是“如何充实某种思维方法”。当大学决定了教育应该为国家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的时候，也就背叛了学术和科学的自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在1949年底举行的全国第一届教育工作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长的马叙伦把新中国教育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中国大学开始步入苏联帝国的覆辙。

从1949年到1950年将近两年的时间，所有的大中小学教师都在接受一场政治学习运动，公民课被取消，博雅教育在中国被彻底终结。在学校稳定之后，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开始了。“这种对灵魂的改造像是脑叶切除术，有时是极端的粗暴行动，还有就像输液，把一种恐惧的药液输入身体里”（万方）。学校停止上课，学生们被动员起来揭发他们的老师和校长。紧接着，高校教师和数十万知识分子作为土改工作队队员下乡参加土改。

1951年底，燕大被改为国立，毛亲自给陆志韦签发了校长任命书，并题写了“燕京大学”的新牌匾。这张任命书和新牌匾墨迹未干，一场天翻地覆的“院系调整”就让其变成纪念品。包括燕京大学在内的所有教会大学都被彻底拆分并入其他院校，而且连名字都被取消了。“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那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外籍教授，大都被当作“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者”驱逐出境。

在这场政治洗牌中，北大鸠占鹊巢，从沙滩迁入燕园，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雅当年捐建的博雅塔成为北大的新地标。毛泽东用他那放荡不羁的毛笔字统一了几乎中国所有大学的LOGO。全国高等院校从211所缩减为182所，综合性大学从55所锐减到13所，所有的私立大学都被取缔，教育实现了彻底的国有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被统统取消，财经和法学等仅有少量保留。1949年之前，全国各大学共有20多个社会学系，进入社会主义以后，社会学却没有了。费孝通在中南海的一个会场上向毛苦苦哀求，希望给社会学留点苗苗时，毛的手势和语气都非常干脆：不能留，坚决断子绝孙！“大学还是要办的，不过我说这里说的是理工大学。”调整后的中国大学几乎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高级技工培训基地，工科占主导地位，基础性的理科和思想社会人文类被大幅削弱。文法商科大学生以前要占在校生的二分之一，如今被彻底边缘化，骤减到不可思议的9.6%。

最为不幸的是，“教授治校，学术独立，言论自由”的现代理念本来已经在中国大学已经扎根发芽，一夜之间即被辣手摧花。作为社会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被从结构上和体制上彻底打散。作为西南联大主体的清华大学被强行改成工科大学，大批知识分子被圈入政府直接控制的社科院，与青年一代隔离。在大学每个班级都设立了政治辅导员。所谓的“科学院”从属于宣传部；在“宣传”面前，科学也就不存在了。从来视自由为生命的知识分子不仅失去了职业上的自由，民间报刊的禁绝也取消了思想表达的自由平台。顾颉刚在50年代的日记中写道：“到京8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

1954年，《共同纲领》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取代，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拉开帷幕；民主党派被彻底改组，联合政府洗去彩妆，恢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真实。1957年，曾昭抡被撤去高教部副部长职务，成为“大右派”，10年后孤独的死去，他的夫人俞大此前自缢而亡。随着合作化、反右、大跃进、社教，直至文革等一系列运动的持续深化，中国彻底取消了文官制度，权力重归世袭化；不论是做官还是谋生，参军成为大多数人唯一的上升通道。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如果说反右运动敲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丧钟，那么接下来则是一场盛大葬礼。林昭被处决，聂元梓成为英雄，曾经领导了五四运动的北大又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红卫兵”诞生于清华大学，这个曾经培养出许多物理学家的大学将最有才华的物理学教授徐璋本送进监狱，包括饶毓泰、翦伯赞在内的数十个著名教授自杀身亡。翦伯赞自杀时，他口袋里还装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陈寅恪与“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的傅斯年，这对当年柏林大学的同学，

归国后一个在北大，一个在清华。1949年，陈寅恪与傅斯年做出相反的选择；20年之后，一代学贯中西史学大师在批斗中竟被活活折磨死。

这场铲除一切文化和文明的浩劫虽然没有取消大学，但终止了高考。“读书越多越反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由权力选拔的“工农兵学员”来到大学“停课闹革命”，工宣队和军宣队的革命小将们将“反动学术权威”押上批斗台，将“牛鬼蛇神”送进牛棚。这些曾经的大师如今“只是一头被赶赴屠宰场的牲畜，任人宰割，任人驱使”（季羨林）。家破人亡的张东荪终于惨死在监狱；跟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的学术生命早在1949年就已经结束。作为中国物理学的泰斗级人物，叶企孙沦为乞丐，穿着破棉鞋，遇到自己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风烛残年的熊十力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终日游荡在街头，口中悲叹：“中国文化亡了！”

随着文革的结束，进入后毛时代，中国大学和知识分子迎来了一场艰难的复苏。知识从某种程度上代替了出身，精英阶层的构成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恢复高考30多年后，大学的数量和每年的招生数量增加了数倍至数十倍。大学从技术精英教育变成了为了“地上面包”的大众职业培训。教育产业化，高校市场化，管理官僚化，扩招，圈地，兼并，改名，从学校改为学院，从学院改为大学。大学越来越像官场，越来越像公司，贩卖官位和文凭，“招天下英才而毁之”（资中筠）。教授被称为“领导”或“老板”，“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像王立军毛新宇孔庆东方滨兴这样的博士和教授成为这个大学时代最杰出的标志。

当年在穷山恶水茅屋瓦舍间，西南联大仍不失为世界一流的大学，正如梅贻琦所言：“大学者，非有大楼只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如今的大学，只有大楼，没有大师。随着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加上“近亲繁殖”，当年那些学贯中西、具有世界背景的通才大师已经绝迹。中国的大学、教授、以及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在数量足以傲视全球，但不幸的是，也仅仅在数量上。据说中国现有博士5万，硕士40万，本科690万，均大大超过美国，但中国的教育实力却只是美国的12%。第一个来到中国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说：“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正直、纯正的品性。……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

历史是对现实的讽刺。“亩产万斤”的钱学森临终时遗言：“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后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1000多年前，大思想家韩愈写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后记

作为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我对大学所知不多，甚至也没有多少兴趣。陈远的《燕京大学1919—1952》给了我一次意外的机会，或者说为我提供了一个不经意的窗口。我就像一个闲逛的路人不经意的走进一所古老的大学，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而新奇的，因此也勾起我莫大的兴趣。

我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来阅读，几乎是沉醉在一个逝去的大学年代——原来大学是这样的。对大多数读书人来说，大学是他们最熟悉的生活场景，这也使得关于大学和知识分子的图书汗牛充栋，而且一直是畅销不衰。这次阅读和写作对我而言算是一次迟来的补课，得到了一次满足的“知识充电”。

我个人以为，与蔡元培胡适司徒雷登时代的大学相比，今天的很多大学完全名不副实，甚至根本算不得大学；那些所谓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和教授，其实也只是一种身份和称呼而已，与学识品行无关。在某种程度上，今天中国只有党校，没有大学。

《燕京大学1919-1952》

近日以来，夏业良被北京大学解聘一事掀起轩然大波。夏业良其实是一个温和的体制批评者，校方给出的理由是，其“教学评估成绩连续多年倒数第一”。在此之前，张雪忠教授因发表《中国需要去马克思主义化》被华东政法大学停止授课资格。张雪忠还曾致信中国教育部，建议取消大学政治必修课及政治考试科目。

现实是如此骨感，正如网络是如此丰满。我应当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互联网时代。网络是比巨舰大炮更伟大的创造，如果说后者曾经将中国带出1840的话，那么前者则使中国走出1984。网络营造了一个信息免费开放的知识民主时代，知识不再被垄断在少数大学人手里，也不再被禁锢在图书馆里；只要愿意学习，只要具备自学能力，这个人就身处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大学里。在这个虚拟的现代大学里，只有学习，没有文凭；三人行，必有我师，大学精神在这里终于回归。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我就是互联网大学的一名学生。如果说这篇文章是一篇作业的话，那么《历史的细节》或许算得上是一份答卷，或者一份小小的毕业论文吧。当然，在这个大学里，永远没有毕业生。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